



# 蘇俄：

## 官僚集團如何奪權

作者：喬治柯林斯 (George Collins)





# 導言：紀念俄國革命九十週年

彼特 塔菲 (Peter Taaffe) 作於 2007 年  
英國社會主義黨 (Socialist Party) 總書記

與十年前不同，在東歐和前蘇聯地區已經發生了各種各樣的「顏色革命」，以及現在在緬甸爆發的番紅色革命。這些革命之所以能為統治階級接受，是因為事實上他們並沒有挑戰資本主義統治，而是力求鞏固和「完善」它。

相比而言，發生在 1917 年的俄國革命則是第一次為工人階級尋出路。正如保皇派將軍紮列斯基 (Zalesky) 其悲痛地看著俄國革命時對被「剝奪」了的資本家和地主所說的：「誰會相信法院的看門人會突然成為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或是成為醫院的管理者，亦或是成為了公務員，昨日的下級士兵成為了指揮官，昨日的奴隸成為了普通勞動者或市長，昨日的列車加油工成為了主管，昨日的鐵匠成為了工廠的主人？」。

但是在俄國革命中這是千真萬確發生的事情。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群眾推翻了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摧毀了酷刑室般的沙皇獨裁。此外在十月革命中俄國工人奪取了政權並之後建立了真正的工人民主。

在過去的 90 年中，對工人階級而言，有許多次機會踏上俄國工人 1917 年所走的道路。而不是羅伯特-丹尼爾斯 (譯注: Robert V. Daniels, 《共產主義在俄國的崛起和失敗》(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Russia) 的作者) 錯誤地認為那場革命不過是在工業化第一階段「不發達」社會中的產物。

然而在二戰後，革命浪潮甚至比俄國革命更猛烈地席捲西歐——在意大利、法國、以及在英國。在 1968 年法國發生了歷史上最大的總罷工，約有 1000 萬工人參與。他們佔領工廠奪取權力，但是卻被自己的組織——共產黨、工會和社會黨領導人阻止。在 1974 年葡萄牙革命中，資本主義政府解體。絕大多數葡萄牙軍官都非常激進地向社會主義方向邁進。(而在俄國，軍官們依然對革命非常敵對和極不饒恕。)

在所有這些事件中，革命可都是發生在「發達」的先進工業化歐洲。作為一種顛覆社會的革命在已經沒有出路時就會爆發。在此之前，群眾們會多次前進和後退直到他們相信有必要承擔起「最後的戰役」。九個多月的俄國革命 (譯者注：從 1917 年的 2 月革命開始) 就是這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中不斷發展前進的。

7 月所發生的事情為反革命的反撲準備了土壤，殘暴地聯手鎮壓布爾什維克並對其拋出大量誹謗。這最終導致，保皇派分子科爾尼洛夫將軍在與克倫斯基聯盟的掩護下試圖扼殺用鮮血換來彼得格勒 3 月份的革命果實。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聯合政府在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群眾呼聲壓力下被迫釋放了布爾什維克的一些領導人，如托洛茨基，讓他們去保衛彼得格勒以便於粉碎科爾尼洛夫的軍事政變。

同樣地當斯賓諾拉 (Spinola) 將軍試圖破壞 1975 年葡萄牙革命時，葡萄牙工人階級不自覺地摹仿了其兄弟姐妹 58 年前的行動，完全壓制了斯賓諾拉的力量。工人階級的團結甚至幫助其戰勝了斯賓諾拉的特種傘兵。而這些反過來推進了革命進程，70% 的工業從而被接管。

可是 1917 年科爾尼洛夫的失敗並未導致類似的結果在俄國出現出現。因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反對奪取政權和建立社會主義政府的主張。

革命不是如同資本主義歷史學家所宣稱的少數人密人謀政變的產物。丹尼爾斯的書中卻認為十月革命可以預防：「如果溫和的蘇維埃領導人可以搶在布爾什維克進行號召——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之前通過對權力的全面掌握來阻止發生」。他接著引用另一位歷史學家說的：「如果克倫斯基立即宣佈和平並將所有土地交給農民，列寧有可能永遠不會走進克里姆林宮。當然這些的綱領是由布爾什維克在 1917 年提出的而不是憑空假設的。布爾什維克拒絕了為其反對者獲勝利上保險的溫和因素」。這些「溫和派」被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所束縛而不會得出如此的綱領。深入土地改革遭遇到地主和資本家們的強大阻力。通過銀行資本的聯合他們 (「溫和派」與地主和資本家們) 往往是一體的。

作為資本主義民主革命任務之一的俄國的農村革命只有在工農政府取得政權後才能真正完成實施。

1917年當時布爾什維克，也只有布爾什維克一直在為此奮鬥。

最初群眾對布爾什維克的思想還很疑惑和敵視。在7月當布爾什維克遭到迫害轉入地下時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影響下鄧尼茨礦工們在約5000人參加集會中宣誓道：「我們對我們的孩子和上帝發誓……我們將永遠不會放棄由1917年2月28日鮮血換來的自由……我們決不會聽從將會帶領俄國走上毀滅的列寧主義，而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告訴我們，地將無償地給人民；資本主義體系必在戰後結束，並被社會主義體制所取代」。

正如托洛茨基提到，這誓言是直接反對布爾什維克在現實中領導革命。他們需要的是土地、和平、麵包和自由。而他們的對手正嘗試的這個體制無法提供這些給他們。

漸漸地，群眾們看到並理解了布爾什維克的主張，對其的敵視早已拋出腦後轉而堅定地支持。一名莫斯科衛戍部隊的士兵說道：「在科爾尼洛夫失敗後，所有的軍隊都染上了布爾什維克的顏色，所有人被影響，因為布爾什維克曾說過的話成為了現實」。

## 布爾什維克的增長

布爾什維克在8月和9月大量增長。群眾們喊著布爾什維克的口號如同他們呼吸空氣一樣自然。反過來說，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垮臺了：布爾什維克在莫斯科杜馬選舉得票從6月的37萬5千到9月增長為54萬張。

莫斯科衛戍部隊90%支持布爾什維克，在一些分隊裡支持率甚至達到95%，在車間和工廠委員會裡，同樣的發展也是顯而易見的。在2月革命開始時，布爾什維克僅是少數派在蘇維埃占1%—2%，列寧4月歸國後也只達到4%。

在那時，列寧曾宣佈道：「必須承認這個事實，在大多數工人代表蘇維埃中我們黨處於少數地位，比起受資產階級影響並把這種影響帶給無產階級的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分子的聯盟……暫時還處於較弱的少數地位。……當這個政府（譯者注：蘇維埃）還受資產階級影響時，我們的任務只能是耐心地、系統地、堅持不懈地、特別要根據群眾的實際需要來說明他們的策略的錯誤。只要我們還是少數，我們就要進行批評，揭示錯誤，同時宣傳全部政權歸工人代表蘇維埃，使群眾從實際經驗中糾正自己的錯誤。只要我們是少數，我們就要進行批評，使群眾不再受騙。我們不希望群眾相信我們的諾言，我們不是江湖騙子。我們希望群眾從實際經驗中來糾正自己的錯誤。」（列寧：《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第114—115頁。）科爾尼洛夫失敗後，這得到了證實。

革命是一個進程，丹尼爾斯說道：「革命是需要經過不同的階段的長期發展」。可這個在時間範圍上看總體上沒錯的解釋並不適用於俄國，因為當時亟需終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血腥屠殺帶給革命的專制特徵和高度緊張。但革命最終達到即政權問題的提出這一決定時刻時，如果被壓迫的群眾沒有抓住這個機會，那麼在革命處於低潮時前剝削者會設法通過反革命篡奪革命果實。因為這曾真實地發生在1925—1927年革命失敗後的中國，當時的中國身處在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的血腥恐怖之中，以及陷入帝國主義如日本侵略軍的殘暴行為中。

毋庸置疑，如果工人階級不奪取政權，那麼新的科爾尼洛夫和恐怖統治將隨之出現，而不是出現資本主義教授們所說的「溫和」的人道資本主義民主。但革命是由整個前期和存在著的先決條件決定的。俄國統治階級（貴族、保皇派、官僚和政治上較弱的資本家）腐爛消失掉了，因為他們沒有真正紮根於人民群眾。

被壓迫民族要求的自由被妥協者所出賣。當時農民起義以及對土地要求的提出相當普遍。77%的農業部門在那年的秋季起義。而主要集中在大工廠和活躍地區的工人階級也感到他們「不能再像這樣下去了」。這是1917年人民情緒的無疑反映。

存在革命的可能，然而革命機會依然會由於錯誤的領導而逝去。在1917年之前和以後的歷史中證明了這點。與馬克思一同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締造人的恩格斯曾指出在整個社會發展的某些階段中可能會20年如一日的沒什麼改變，也可能在一天之內凝聚了20年來所發生的事件。

廣而言之，這是革命時期的特徵。由於謀殺的威脅自從 7 月以後就在芬蘭處於地下的列寧曾催促布爾什維克領導革命，他認為俄國的命運將在兩三天內被決定。

事實上工人階級和窮困農民奪取政權的可能性持續了僅僅兩到三月，其可能是 9 月或 10 月。在 10 月革命之前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群眾突然變的急躁，嘟囔著說布爾什維克和其他政黨一樣不願奪權。同時在布爾什維克的左翼中無政府主義者開始增多。

在彼得格勒的托洛茨基認識到在蘇維埃方面發生了許多的巨大變化。其本人也隨即果斷地加入了布爾什維克。同時克倫斯基的聯合政府試圖將最革命的士兵部隊調離彼得格勒，這明顯是為了準備對付「布爾什維克」的彼得格勒。

當時作為蘇維埃主席的托洛茨基領導彼得格勒蘇維埃組成了軍事革命委員會以保衛革命果實。這個機構直接指揮了十月暴動。要作到這一點，其需要「客觀因素」的存在——布爾什維克。這個政黨的存在導致了十月革命獲得了勝利。

## 國際影響

丹尼爾斯認為布爾什維克在國際主義的觀點徹底迷失了：「儘管對 1919 年寄予厚望，世界革命並沒有出現。」與此相反，十月革命本來只是「震撼世界的十天」。列寧和托洛茨基認為俄國革命不過是歐洲和世界革命的導火索。

1918 年的德國革命、1919 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及一連串的政治動盪，但如果歐洲其他地區的工人階級具備嚴格像布爾什維克般的領導，那將完全改變歐洲和世界的情況，並將改變歷史。群眾性政黨的作用不能與革命進程分開，它就像難產時婦產醫生用的鑷子一樣重要。沒有它革命就可能流產。

儘管在 20 世紀有許多的革命機會和革命地區（例如在尼泊爾），可卻只有俄國工人階級直接奪取了政權，並在短時期內（1917-1923）建立了真正的工人民主，它這意味著所有官員來自選舉，可隨時罷免及只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

由於極權主義史達林主義的疫病，舊工人階級組織社會民主黨、共產黨的萎縮和瓦解，和他們控制的醜惡官僚機構。新一代青年和工人往往拒絕「黨」的主張甚至排斥任何組織。

然而沒有一個高瞻遠矚的革命領導層的群眾性政黨，歷史證明革命機會可能被浪費甚至給群眾帶來可怕的後果。俄國革命的教訓是需要一個基於政治覺悟工人的自覺控制及其將民主和影響力反映在各個方面的政黨。

這同樣適用於需要從資本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可丹尼爾斯寫到：「每個偉大的革命都以某種形式的獨裁統治而告終。」所以他認為這將會繼續發生在未來。丹尼爾斯到現在為止完全無視革命所面對的客觀現實。

舉例來說，18 世紀偉大的法國大革命發生在嚴格具有較高經濟文化水準的國家裡。而周邊國家卻極度的恐懼，他們害怕將會遭遇與法國貴族和皇室成員一樣的命運。於是封建歐洲聯合英國資本家們一起反對革命法國。這個因素導致革命被迫從民主轉變成波拿巴的獨裁統治。

俄國革命，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偉大事件的發生是基於工人階級最民主的組織——蘇維埃（工人委員會）——，由此出現歷史上未曾見過的最民主的工人國家。

其墮落並不是像丹尼爾斯和其他人所簡單認為是由於史達林主義是馬列主義所固有的內生物。而是因為俄國革命的孤立。列寧和托洛茨基從來沒有認為在經濟文化如此落後的社會裡能孤立地建立起社會主義。只有歐洲革命的勝利並通過建立一個歐洲社會主義聯邦才會保證從一開始民主就會鞏固並擴大。

然而事態發展是相反的，這個年輕的工人國家面臨著內戰。一無所有的地主和資本家與 21 個帝國主義軍隊勾結起來試圖破壞這個國家。在這一時期，革命僅限於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其餘的俄國地區還在地主和資本家反動分子手中。可是通過革命階級的努力和國際主義影響最終是布爾什維克獲得了內戰的勝利，而這如果得到歐洲和世界工人階級的大規模支持是非常有效的。丹尼爾斯認為布爾什維克在內戰期間的專制是其固有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訴斥布爾什維克禁止其他黨派反對他們。但他忽視了一個細節。除了法西

斯主義者右翼反動分子黑色百人團以外，所有的政黨都被允許在革命的第一階段存在。只是當他們組織軍隊訴諸內戰方式時布爾什維克才被迫採取行動。

試想一下：美國總統林肯會允許奴隸主在內戰中發展？他允許他們建立自己的地盤？在英國內戰中克倫威爾及議會軍會讓查理一世繼續保留自己的軍隊？

只是假設提出的問題就證明在階級內戰中剝削者所謂的「民主」是如何荒謬和抽象。然而，這些方式可能沒有必要。當革命在一個發達的工業國家裡發展，其將不可避免的在國際上傳播。現在世界金融市場的巨大震動—正預示著未來的經濟衰退。

許多人譏笑在現代社會中的革命前景，但動盪伴隨著大量的「對社會不幸」的發洩（他們可以自由地將這些解釋為革命，雖然它們（革命）仍然處在資本主義體系的「週邊地區」）也將在 21 世紀的「發達」社會中成為現實。

# 目錄

編者前言	2
序	3
俄羅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	4
工人國家的孤立與墮落	9
一國社會主義	21
官僚集團的反革命	26

## 編者關於本手冊的說明

這本小冊子由喬治·柯林斯(George Collins)寫於1987年，當時他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南非支部的一名成員，當時的工國委(CWI)南非支部也是非洲國民大會(非國大-ANC)內的馬克思主義工人流派。其主要出版物是《工人要塞》(Inqaba ya Basebenzi - workers' fortress)。

這本手冊最初是為南非支部成員所撰寫的，其時的南非白人少數政權通過壓迫和種族隔離(Apartheid)實施殘酷統治。種族隔離制度是用於對不同種族進行隔離和歧視南非多數人口黑人的殘酷制度。

作為本書的開場白，作者希望明確說明，南非當時實施的不符合標準的「班圖教育模式」(Bantu Education)剝奪了黑人多數人口受到良好教育的機會。這使得更有需要對1917年俄國革命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有一個明確的解釋。在20世紀80年代，越來越多的工人和青年們在反對種族隔離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尋找激勵人心的思想，同時也需要對於蘇聯的錯誤和其原因有一個解釋。

經過了數輪波瀾壯闊的革命鬥爭後，1994年種族隔離政權終於土崩瓦解了。而這些鬥爭可以溯源到1976年索韋托中學生反抗(最初它只是起源於一場為爭取更好的教育而進行的鬥爭)和建立獨立的和跨種族的工會，在這些抗爭中工國委(CWI)南非支部發揮了自己的作用。

工國委(CWI)美國支部社會主義選擇(Socialist Alternative)在2000年的時候曾將這部手冊掃描後發佈在他們的網站上，我們在此重新發行這本手冊和隨附的前言，以表感謝。

就在這本小冊子完成不久(的1980年代末)，工國委(CWI)內部就史達林主義國家的危機和其可能導致的問題進行了相關討論。1988年12月工國委(CWI)在比利時召開的大會上，那些後來成為工國委(CWI)內部「多數派」的成員提出在蘇聯發生資本主義復辟——即「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可能性。(請見彼特·塔菲(Peter Taaffe)所著的《戰鬥派的崛起》(The Rise of Militant)一書328頁)。當時「戰鬥派」的創始人之一泰德·格蘭特(Ted Grant)並不接受這一分析。但是，1989年11月將史達林主義的東柏林與(資本主義的)西柏林分割開的著名的柏林牆倒塌了，蘇聯的史達林主義統治在1991年也崩潰了，資本主義得以復辟。本網站([www.marxist.net](http://www.marxist.net))上的文件是由工國委(CWI)的多數派和在史達林主義崩潰後跟隨泰德·格蘭特的少數派所共同製作的。

然而不幸的是泰德·格蘭特並未能理解以史達林主義崩潰為標記的時代改變。在南非，資本主義政權能夠順利地從搖搖欲墜的種族隔離政權處轉移到黑人階級群眾運動中日益親資本主義的領導層手中，這為其打開了大門。革命在這一階段出軌了——這是1988年12月在比利時開會時工國委(CWI)多數派所曾經提出過的一個前景。泰德·格蘭特拒絕接受這一前景展望，並在一段時間內說服了工國委(CWI)南非支部的一些領導人接受其觀點。由此，當1990年曼德拉被釋放之後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工國委(CWI)南非支部的一些領導人迷失了政治方向。



## 序

在南非托馬霍爾（Tumahole）鎮從事地下運動的一名年輕活動人士，只有 20 歲的本加尼（Bongani）同志的表現反映了世界各地嚴肅的鬥士對於社會主義理論的渴求。當一名記者問他「人民教育」意味著什麼的時候，他是如下回答的：

「我指的是教育形式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滿意，因為，所有人都能參與到決策中從而有助於所有人的利益。」  
「例如，關於 1917 年俄國革命的問題，因為俄羅斯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所以班圖教育[南非國家當局強加給黑人的歧視性的學校教育制度]會告訴你共產主義這樣那樣不好，它有多糟糕。」

「但他們不會告訴你在那個階段俄羅斯發生的真正事實.....」

「你是否願意看到在這個國家出現社會主義？」

「是的，因為它將消滅資本主義。」

「你是怎樣理解資本主義？」

「這是一個由某些個人擁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我的父母從星期一至星期五可以生產 1000 蘭特（南非貨幣）的商品，但是他或她卻只能得到 50 蘭特。因此，我們的父母被人剝削，而使那些人得以致富。」

「這就是為什麼我更喜歡社會主義，因為工人階級將控制生產。」（《金融郵報》（Financial Mail），約翰尼斯堡，1986 年 10 月 31 日）

這不是偶然現象，這位同志使用俄國革命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俄國革命是迄今為止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在世界範圍內具有明確覺悟的社會主義革命，它無可辯駁地證明瞭推翻反動階級統治和建立工人階級統治的可能性。儘管資本主義媒體和教育體系竭盡抹黑之能事，但是世界各地的工人、青年和農民（尤其是不發達國家的農民）都知道十月革命之後俄羅斯發生的驚人轉變，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成為超級大國。

由於這些原因，俄國革命繼續鼓舞著全世界數以百萬計被壓迫人民以贏得他們自己的勝利。出於同樣的原因，也沒有其他事件包含著更對對於今天工人運動的根本性教訓。

什麼是「俄羅斯在那個階段發生的真正事實？」根據什麼樣的綱領俄國工人階級奪取了政權？而這一綱領的根本性目標對於我們今天的鬥爭是否仍然適用？

本加尼同志稱俄羅斯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在何種程度上 1917 年革命的綱領得以實施？在何種程度上俄羅斯向前推動了共產主義？

具有政治覺悟的工人們都知道蘇聯存在嚴重的問題。1956 年，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曾經譴責嚴重的腐敗和鎮壓，而這正式其前任史達林時代從 1920 年代到 1953 年去世期間的蘇聯特徵。但三十年後，戈巴契夫則繼續譴責蘇聯後來官僚主義的嚴重問題。

南非共產黨領導人喬-斯洛夫（Joe Slovo）同志今天表示他感到「憤怒和厭惡」作為一個史達林政權的辯護者。（《觀察家》報採訪，倫敦，1987 年 3 月 1 日）

但是，譴責、憤怒和厭惡回答不了這個現實的問題：1917 年以後蘇聯發生了什麼從而產生一個沉迷於大規模鎮壓的政權？70 年後，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建立的工人民主制度還有什麼殘餘？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必須充分地 and 公開地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對於俄國革命和其隨後的墮落的關鍵性批評與資產階級們對蘇聯的仇恨之間毫無共同之處。我們需要知道「真相」以汲取教訓，並正確地回應當今蘇聯領導人的政策。

同志們需要組織相關討論，對這些事件和解釋它們的思想進行分析，提出相關疑問和想法進行辯論。這本小冊子的目的是供大家進行討論和對進一步的閱讀做一介紹。例如，手冊的四部分中的每一部分都可以作為一個小組討論的基礎。個別同志可以根據相關主題（章節）進行細分後主講。在本書末尾所列的書籍和手冊可供那些有興趣更詳細瞭解相關問題的同志們進行進一步研究。

開展相關學習和從中吸取教訓是紀念俄國革命的最好方式。

喬治-柯林斯，1987 年 10 月

# 第一章：俄羅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

## 1. 十月革命

俄國首都彼得格勒，1917年10月25日晚上，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槍聲還迴蕩在歐洲戰場上時，俄國革命到了決定性的時刻。武裝的工人糾察隊和士兵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下控制了城市。孤立且聲名狼藉的親資本主義臨時政府已不復存在。

在斯莫爾尼學院（之前的女子中學），工人和士兵代表組成並召開了蘇維埃大會。

有些代表是職業政治家、左翼知識份子或者激進軍官。但絕大多數是普通工人的代表：「衣衫破舊的士兵、沾滿油污的工人，農民——窮人組成的群眾，他們需要在生存的殘酷鬥爭中摸爬滾打」（約翰·裡德（John Reed），《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然而卻充滿了對未來革命前景的期待，和一種決意徹底終結壓迫的激情。

中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指責布爾什維克，稱這次大會破裂了！然而工人、農民和士兵代表們一個接一個以群眾真正的意志和願望將這些人的聲音給淹沒。

一個士兵明顯感受到這一情緒：「我告訴你，拉脫維亞的士兵們已經多次說過：不要更多的決議！不要更多的空談！我們要行動——權力必須掌握在我們手中！」

大廳「被歡呼聲所震動……」（據約翰·里德說）

在驚天動地的掌聲中，布爾什維克宣佈把政權移交給工人蘇維埃。布爾什維克發佈一份《告工人、士兵、農民書》被廣泛採納。在公告中概括了這些當前的任務：

「蘇維埃政權將立即向各國人民提出民主的和平，立即在一切戰線上停戰。蘇維埃政權將保證把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無償地交給農民委員會處理；將使軍隊徹底民主化，以維護士兵的權利；將建立工人監督生產的制度；將保證按時召開立憲會議；將關心城市的糧食和農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將保證俄國境內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決權。

代表大會決定：各地全部政權一律轉歸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各地蘇維埃應負責保證真正的革命秩序。」（約翰·里德的書中引用，第115頁—第116頁）

擁有一個革命的工人政黨政府，以及貧困的農民群眾的支持，俄國人民把他們自己從幾個世紀的奴役中解放出來。並以此摧毀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條件。

列寧參加了當晚的大會。當他的聲音終於能夠在如雷的掌聲中被人們聽到時，他的第一句話是確認在日程表上的民主革命任務：

「我們將從現在開始構建社會主義秩序。」

在此前多年的艱難鬥爭當中，馬克思主義者們在理論上解釋了在這一任務中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措施。而現在布爾什維克領導者們得以現實的語言來解釋這些理論。

列昂·托洛茨基，作為僅次於列寧在俄國革命中最具權威的領導者，在列寧發言之後也表示：「我們把我們所有的希望都寄與我們的革命能夠引發歐洲革命。如果歐洲的起義者不能摧毀帝國主義，那麼我們將會被摧毀。……或者俄國革命將能夠捲起西方鬥爭運動的旋風，或者所有國家的資本家們將摧毀我們的革命。」（托洛茨基（L. Trotsky）《俄國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第三卷，第315頁）



一位代表寫道：代表們用巨大歡呼歡迎這些發言。很明顯，列寧和托洛茨基表達了當晚在斯莫爾尼學院的大多數革命鬥士的想法和感受。

這樣，在其最初的幾個小時裡，新的無產階級政權重述了馬克思主義兩項基本主張——不再只是作為理論概念，而是作為國家政策的基礎：

(a) 在一個像俄國那樣的不發達國家裡，民主和土地問題只能通過工人階級統治來解決，而這將終結資本主義和向社會主義過渡。

(b) 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局限在一國的範圍內；它只有通過在世界範圍內推翻資本主義才能進步。

這一小冊子的其餘部分是關於 10 年或 20 年後俄國革命的命運和工人民主被可怕的官僚主義專制所替代。通過認真學習這些發展，能夠為現在推翻資本主義的鬥爭提供及其重要的教訓，也能學習瞭解在未來工人民主的健康政權的結構。

## 2. 反革命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最有可能首先在發達國家被擊敗。那裡的工人階級最強大，並且存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工業基礎。

然而在 1917 年 10 月，世界資本主義鏈條上最脆弱的一環首先破裂。

布爾什維克政府繼承了一個跡近崩解的落後社會，整個社會因為 3 年戰爭和對德國的一連串戰敗而消耗殆盡。

帝國主義不能容忍布爾什維克在俄羅斯挑戰他們的權威的和威脅他們的利益。正如一位親資本主義歷史學家公開承認：「他們（帝國主義領袖如英國的邱吉爾和法國的福煦）警告說布爾什維克主義是對國際社會非常危險的威脅，應該在它還很虛弱時將其剷除」。(J.N. 威斯特伍德 (J.N. Westwood), 《俄羅斯 1917-1964》(Russia 1917 to 1964), 第 38 頁)

在俄羅斯國內特權和反動階級，以及勞工運動中的改良主義者，用他們能夠使用的任何方法反抗革命——抵制、經濟破壞，甚至是以總罷工威脅。

通過體系化的在工廠、地區和國家層面的委員會，工人對生產的控制得以實現，從而對資本家行為進行了一些限制。但是，事實上沒有任何方式能和平地約束由革命所帶來的階級鬥爭的爆發。

一方面，資本家拒絕屈服於工人管理。另一方面，當工人能保證他們的權力的時候，他們不會止步於「控制」資本家。他們完全地控制了工廠，甚至還不等政府提供支援和補給。

這些鬥爭清楚地驗證了托洛茨基在他的「不斷革命」理論中闡述的前景：一旦工人階級掌握了政權，即使是在一個落後的國家中，就不可能把他們的綱領局限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工人不可避免地會發展到沒收資本家資產和進行社會主義過渡。

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描述了當階級鬥爭加劇，俄國社會越來越趨於癱瘓：

「在 1918 年春天，俄國經濟接近完全崩潰。貨幣失去了價值，製造產品從商店消失，由於一般的貿易通道停止運轉，造成商店都關門大吉，四處遍佈投機和腐敗。」(瑟厄道瑞-馮-勞爾 (Theodore H. von Laue), 《為什麼是列寧？為什麼是史達林？再評俄國革命，1900-1930》(Why Lenin? Why Stalin? A Reappraisal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00-1930), 第 154 頁)

由於食物供應陷入癱瘓，饑荒在城市日益嚴重：當工業產品甚至不能通過以物易物獲得，農民為什麼要為城市市場種植糧食？

革命採取了它的對策。由於資本家不斷的陰謀破壞與抵制，銀行在 1917 年 12 月被佔領和國有化。工人自發地接管越來越多的工廠，直到 1918 年 6 月法令將所有重要的工業部門國有化。

貧農委員會和武裝的工人糾察隊，被組織起來沒收被富農 (Kulaks) 囤積起來的穀物。

階級間不可調和的鬥爭發展成全面的力量較量。武裝反革命開始出現，它的基礎是帝國主義勢力和富農、資本家、沙皇殘餘的聯合。從 1918 年 5 月一直持續到 1921 年春天，俄國內戰斷斷續續地進行著。

內戰，像革命一樣，強迫每個人選擇立場——支持或反對政府。右翼「社會主義者」、前革命者和改良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憎恨超過他們對反動的恐懼（一貫如此），他們很大一部分加入到對工人國家的猛烈進攻中。

1918年3月，英國軍隊佔領了摩爾曼斯克北部港口，在8月他們攻佔阿爾漢格爾斯克，切斷了俄羅斯的出海通道。在4月，日本軍隊在東西伯利亞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陸。

「受到聯合軍事干預的鼓舞，」著名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 E. H. 卡爾 (E. H. Carr) 寫道「右翼社革黨（所謂的社會革命黨的右翼，主要由富裕農民組成）在他們在莫斯科 1918 年 5 月的會議上公開一項政策，推翻布爾什維克專制統治然後在普選的基礎上建立政府，並且願意接受協約國幫助在戰爭中對抗德國」——即一個親帝國主義政府！（《布爾什維克革命 1917-1923》(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第 170 頁）

孟什維克分裂成很多小團體，然而「有一點相當堅定——他們對（布爾什維克）政權充滿敵意」。（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 1917-1923》(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第 170 頁）

在薩馬拉，社革黨建立了一個反布爾什維克「政府」並開始招募軍隊。在 8 月他們攻佔了喀山。左翼社革黨（主要由貧窮農民組成）一直和布爾什維克合作直到 1918 年 3 月，因為他們反對政府和德國簽訂的和約，並稱其為「背叛」

而後他們密謀反對政府。嘗試挑起德國對俄羅斯進攻，他們相信這樣能帶來「革命戰爭」。由於完全錯誤估計了形勢，他們在 7 月發動了叛亂，很快就被瓦解了。

西方大國，由於他們對德國的戰爭接近尾聲，把注意力集中到俄羅斯。更多的英國、法國和美國軍隊登陸摩爾曼斯克和阿爾漢格爾斯克，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和義大利軍隊佔領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登陸並向西進攻到烏拉爾山脈。相當數量的法軍被部署到黑海。

同時，帝國主義者資助和武裝反革命軍隊（「白軍」）——由大多數是前沙俄軍官組織落後農民而形成。

維克多-瑟爾基 (Victor Serge)，當時是布爾什維克，生動地描述了 1919 年 10 月極其困難的局勢：

「在海軍上將高爾察克指揮下的白軍是西伯利亞的主人；他們組建了受鄧尼金將軍控制的烏克蘭「最高政府」，準備進攻莫斯科。在北方，由於英國軍團，他們主導了一個模糊的社會主義政府，這個政府由一個反對沙皇的老兵柴可夫斯基主持；而尤登尼奇準備攻佔彼得格勒，在那裡人們由於饑餓死在街上，在大歌劇院門前擺滿了死馬。」（《從列寧到史達林》(From Lenin to Stalin)，第 31 頁）

然而一年後弗蘭格爾（鄧尼金的繼任者）軍隊在克里米亞被粉碎，軍事威脅事實上就結束了。

布爾什維克對國內和國際聯合反動勢力的勝利，最開始雖處於一個極其不利的位置，但正如許多人確信地，這卻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成就之一。

這場勝利是怎樣取得的？

### 3. 布爾什維克怎樣擊敗反革命？

首先使俄羅斯工人國家的生存成為可能的，是國際間工人繼十月革命後一連串巨大的活動。

布爾什維克者的預期得到很好的驗證，歐洲被拖入一個革命時期。勝利的道路向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的工人階級開放。

帝國主義者被他們本國的生死存亡的鬥爭束縛，而不能繼續他們對俄羅斯的進攻。因為這有可能導致更加激怒工人並引發士兵兵變。

匈牙利軍火工人在 1918 年 1 月發動的罷工像野火一樣蔓延到維也納、柏林和整個德國，超過兩百萬工人參與。他們的中心要求，反映了俄羅斯工人的要求，是和平。在芬蘭一個獨立工人共和國宣佈成立。經過數月的激戰，最後在德國軍隊的協助下被鎮壓下去。

然後在 1918 年 11 月 4 日，德國基爾 (Kiel) 海軍基地爆發兵變點燃了德國革命。在數天內各個主要城市控制在工人委員會手中。

這事件對俄國工人階級起到了極大的鼓舞。布爾什維克伊林-詹洛夫斯基，一天晚上休息去了彼得格勒劇院，描述了對整個國家的影響的縮影：

「在一場戲開演前，一個穿著夾克和長靴的人走上舞臺說：同志們！我們剛剛得到來自德國的消息。在德國爆發了革命。威廉（德國皇帝）被推翻了。一個工人代表組成的蘇維埃在柏林建立，向我們發了一封電報致以問候。」

「很難聽到接下來說了什麼……這個消息得到了劇院內數分鐘雷鳴般的瘋狂掌聲的回應……」（《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The Bolsheviks in Power），第 127-128 頁）

在奧地利，大規模罷工和軍隊兵變最終粉碎了哈布斯堡皇朝政權。奧匈帝國分裂，在匈牙利革命蘇維埃政府在 1919 年 3 月奪取政權。

法國到處發生大規模罷工和海軍兵變。英國士兵兵變，在蘇格蘭核心工業區紅旗被舉過克萊德河，愛爾蘭發生了反對英國統治的武裝暴動。1919 年在美國爆發 400 萬工人參加的罷工。

這些事件，很少在官方歷史書中被提及，證明瞭一個所有社會主義者都需要理解的規律：一場勝利的工人革命有不可估量的國際影響，激怒資產階級反動勢力，但同時鼓舞其他國家的工人來保衛它並效仿它。

國際團結的精神是俄國工人最有威力的武器。不是要求「民主」的道德上請願或者資產階級的「良心」，而是把他們同國際的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聯繫在一起。布爾什維克在地球各個角落贏得了大量支持，在帝國主義的後方開闢了「第二戰場」。

各國士兵以同志的方式響應（俄國）革命，在俄羅斯的英國和美國軍隊開始兵變。在黑海，法國水兵舉起紅旗。帝國主義被迫撤回他們的軍隊而拋棄白軍讓他們領受自己的命運。

共產國際的早期會議（見第四部分）上呼籲國際上的工人運動採取行動反對任何對俄國白軍的支持。在 1920 年 7 月，隨著波蘭反動軍隊對俄羅斯的入侵，第二次大會呼籲：

「如果你們發現，在你們的示威之後，你們國家的資本家們仍然在準備一次新的對俄羅斯的幹預，那麼請停止工作，停止一切運輸。不要讓一輛火車，一艘船隻通過前往波蘭。」（引自 J. 德格瑞斯（J. Degras），《共產國際 1919-1943 文件》（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 Documents），第一卷，第 113 頁）

在英國，倫敦碼頭工人向他們的俄國同志顯示了巨大的團結。他們拒絕為喬利-喬治號裝載——提供給波蘭白軍的武器。

在 7 月，在紅軍擊退入侵者後，英國威脅派軍隊到波蘭。英國各地工會組織者們建立起行動委員會，威脅政府如果要進行干預就總罷工。

英國政府——在拒絕蘇維埃對它的最後通牒的回應後的 48 個小時——退縮了。

在俄羅斯戰場上，正如在國際政治舞臺，工人的勝利只有通過布爾什維克不妥協的革命政策才有可能。

一個士兵在彼得格勒的一個群眾集會上的發言清晰表述了紅軍建立所依靠的階級綱領：

「士兵說：告訴我我為什麼而戰鬥……是為了民主，還是為了資本家的掠奪？如果你能向我證明我在保衛革命，那麼我就會出去戰鬥而不需要用死刑來強迫我。」

「當土地屬於農民，工廠屬於工人，權力屬於蘇維埃，那麼我們就知道我們要為何而戰，我們也會為何而戰！」（約翰-里德（John Reed），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第 45-46 頁）

首先在鬥爭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是領導層、理論和綱領；但是接下來，在掌握這些理論的過程中每個個體擔當的角色是一個關鍵因素，需要體現他們階級的前進動力並向其他人指明道路。

想否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發展社會主義綱領的過程中的歷史貢獻。或者否認列寧為十月革命準備了道路都是不可能的。

同樣地，也不可能否定托洛茨基作為人民委員在 1918-1925 年的戰爭中建立紅軍並領導它走向勝利的的作用。

托洛茨基把紅軍作為革命軍隊組織起來，這些士兵是為政治認識而激勵而不是靠盲目的服從。他對組成軍隊的工人、年青人和農民擁有毫不動搖的信任，這在他自己的文字中得到最好的表達：

「需要什麼（來拯救革命）？很少。群眾的先進部分需要瞭解情勢危急。第一位的需要是不隱藏任何

東西，我們的任何弱點。不是和群眾玩文字遊戲，而是直白地表明每一件事。」（托洛茨基《我的一生》（My Life）第 43 頁）

具有犧牲精神的年輕工人被吸收到軍隊成為先鋒。托洛茨基接著寫道：

「蘇維埃，黨、工會從他們的人員中建立新的縱隊，並派出成千上萬的共產主義者（到前線）。大多數年輕黨員都不知道如何拿槍，但他們有贏的意願，而那是最重要的東西。他們在軍隊柔軟的身體裡插入脊椎。」

「求勝的意志」是「最重要的東西」，武器的使用方法可以在短時間內學會，但求勝的意志只能出於一個足以為之戰鬥的目標、清晰的戰鬥目標，以及理解如何實現目標。

布爾什維克們有能獲勝的士氣，而這個重要的因素顯然在白軍那兒是缺乏的。即使是親資本主義的衛斯伍德（Westwood）也不得不承認：「在弗蘭格爾掌控白軍的剩餘部隊之前（註：幾乎已是內戰的尾聲），軍官們為士兵們立下了完美的典範，那是酗酒、搶劫和暴力。殘暴地對待地方居民，明顯意圖恢復地主制的表現，白軍與農民間巨大的社會鴻溝使得後者偏向紅軍」（《俄國 1917 年到 1964 年》（Russia 1917 to 1964））

於是反革命最初的攻擊被擊敗了。但布爾什維克們瞭解到，他們的勝利只不過是在鬥爭中提供了一絲喘息的機會。正如列寧在 1920 的評論：

「我們現在脫離了戰爭進入和平，但我們沒有忘記戰爭會再來。只要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存在，我們就無法和平共存。最後兩者之一必會勝出。」（引自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第 3 卷，第 365 頁）



### 問題討論

1. 為何革命發生在落後的俄國，而非英國或德國這些工人階級更強大的國家？
2. 如果 1917 年列寧與托洛茨基不在俄國，事態將會如何？
3. 革命之所以發生在俄國是因為她獨特的狀況，厭戰情緒、饑荒以及無地農民。那麼，這些不會在這裡發生嗎？
4. 三年的內戰是否顯示布爾什維克只有極少部分人的支援？
5. 布爾什維克如何在內戰中面對軍事上更為強大的敵人？

## 第二章：工人國家的孤立與墮落

### 4. 在國際鬥爭中的挫折

在十月革命後的強大階級運動中，推翻全歐洲的資本主義被提上了行程表。

工人階級在已開發國家的勝利，能夠回過頭來提升俄國當時落後的經濟基礎，並且消滅帝國主義入侵的威脅。

在團結工人以及將工人導向不同國家實際行動並且指導對抗世界資本主義聯盟的意義上，一個國際組織都是必要的。

而第二國際此時已經失去了作為階級鬥爭工具的能力，因此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國際。

#### 工人階級的領導危機

在 1914 年之前，第二國際曾以一切手段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包括總罷工。然而，當戰爭開始之後，其絕大多數領導卻站出來積極或消極地支持他們「自己的」政府。

是什麼造成了這場代價慘重的背叛？

第二國際成立於 1889 年，作為（主要是歐洲）社會民主政黨聯盟，一般而言接受馬克思主義。它在帝國主義擴張期以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穩定成長之時成立，這對它的性質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在第二國際的旗幟下，曾有過許多重要的鬥爭。主要贏得的資本家們的妥協有，例如民主權力、更高的工資、較好的勞動條件等等。而工人貴族—擁有技術並且薪資略高的工人—也在這段過程中出現。而工運的領導層，也越來越多出自於這個階層以及那些想在工運中發展的知識份子。

由於遠離工人的日常鬥爭，這些領導人越來越習於處在國會議員或政黨和工會官員的高薪職位上。無法避免地，他們的思想日益被周遭的環境所影響。他們的意見總結起來，就成為德國社民黨伯恩斯坦所推動的改良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可以經由議會路線，逐步和平地被取代。

這意味著那些想要推翻資本主義國家的鬥爭全部可以擺到後面。「鬥爭」可以在議會的沙發上進行—由那些領著國家高薪的人來進行！

改良主義接受越來越多的不良部分。不可避免地，它促使人們越來越與資產階級合作。工人領袖和各種不同的國家機關扯上關係。公共部門的職位給了他們新的特權。

在這些壓力影響下，導致了他們產生民族主義的視角。社會民主黨人越來越侷限在國家機構與地方政府的層次，和國際運動的連結也僅限於情感或文字上的支援。

在 1914 年八月，政治上逐步的腐化終於爆發出悲劇性的結果，這些改良主義者毫無異議地靠到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旁邊，從此開始，改良主義者公開的反對工人推翻資產階級國家的意圖。

在 1919 年初，一封歷史性的信發送到了各國革命的工人組織手中。由列寧和托洛茨基屬名，代表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的新名）邀請各國工人組織到莫斯科參加大會，其目的解釋如下：

「大會必須建立成一個共同的陣線，以維持整個運動的協調與領導，成為共產國際的中心，協調各地區的利益使其符合世界革命的利益」（引自德格瑞斯（Degras），第 1 卷，第 5 頁）

在這次大會上，1919 年 3 月 2 號到 6 號，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成立。

「共產國際的平臺」在成立大會被接受



「帝國主義制度正在崩潰，殖民地的動亂，各從屬小國的動亂，無產階級在一些國家的勝利，帝國主義軍隊的瓦解…這就是今天世界上各個國家的所面對的問題。

「世界上只有一種力量能夠拯救[人性]，就是無產階級…它必須建立真正的秩序，共產主義的秩序。它必須破壞資本的統治，使戰爭不再發生，取消國家邊界，使整個世界成為一個合作的社區…」

「各國革命運動正在成長，而資本主義國家的聯盟將可能會摧毀整個運動…最終必須協調各國無產階級的行動，而這些都指向一個目標——必須建立一個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共產國際。」

「國際…將實現不同國家無產階級的互助…將支持受壓迫的殖民地人民對抗帝國主義，以推動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最終崩壞。」

工人階級在 1918-19 年間取得的進步，僅僅標示了未來長久的革命與反革命的開始。當蔓延全歐的階級鬥爭開始退潮之時，工人們便無法維持他們之前所爭取到的果實。

這一系列的失敗有兩個主要因素：首先是社會民主黨人惡意的背叛，其次是由於俄國以外的革命浪潮尚不夠成熟，換句話說，即使是在第三國際中的政黨有些也缺乏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領導。

在德國，大部份工人仍然對改良主義社民黨存有幻想。在 1918 年 11 月，由諾斯克和謝德曼為首的改良主義者，自覺地成為了反革命意識的代理人。

他們的策略是說服工人階級接受資產階級的「民主」議會的權威。然後，他們重建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部隊，擊碎了工人的委員會。

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德國工人革命運動的傑出領袖，1919 年一月被他們的「前同志」所釋放出的軍事反革命力量所謀殺。

德國的資產階級仍然薄弱，而工人運動也尚未被擊潰。在大勢底定之前，還經過了許多的鬥爭。

在 1921 年的第三屆世界大會，共產國際的成員數暴增，共有五十一個國家支部，兩百八十萬會員（其中僅五十五萬在蘇聯）。

許多不同的政治勢力都加入了國際，從中派主義（居於馬克思主義和改良主義之間，在文字上同意馬克思主義，但在實踐上搖擺不定）到極左派都有。

在匈牙利，當地共產黨的極左錯誤導致了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嘗試失敗，他們拒絕將土地分給農民，而教條地堅持將地主土地集體化，於是他們無法贏得農民的支持，而無法團結整個國家。

當反革命以羅馬尼亞與捷克斯洛伐克軍隊入侵的形式襲來之時，農民們不願為這個拒絕他們最基本要求政府作戰。

在 1919 年 8 月，經過 4 個月英勇抵抗，工人共和國落敗。工人運動遭到隨後興起反動恐怖勢力的可怕大屠殺。

在義大利，正是那些軟弱缺乏骨氣的中派主義工人「革命」領導者使勝利變得不可能。

1920 年一波大規模佔領工廠的行動創造出了革命的形勢，蘇維埃控制了工廠，赤衛隊護衛著他們。資本主義國家被癱瘓。當時的任務就是動員並武裝工人去奪取政權。

義大利社會黨的「馬克思主義」領導們因下層的壓力所迫宣稱支持共產國際。事實上他們是分裂的，而「最高綱領」（左）派甚至拒絕領導鬥爭。主動權被交給改良主義者，而他們如同以往一樣又將權力交還給資本家——只換來了暫時性的讓步。

在法國、愛爾蘭、英國、荷蘭及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計畫在改良主義工人運動領導者們的幫助下奪回控制權。各種例子表明，這只有在缺乏能夠把握住大量的機會及孤立改良主義者的馬克思主義領導時才有可能，如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所做的一樣。

在 1921 年，工人們在國際上的奮鬥陷入了暫時性的低潮。一個奇特且危險的力量對比的相互關係出現：一方面，資產階級鞏固了在國際間的地位；另一方面，俄國的工人國家孤立且精疲力盡。



## 5. 蘇維埃民主的枯竭

俄羅斯工人國家在內戰中存活下來，然而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1920年，大規模工業的產量下降到1913年水準的14%，而製造業產量小於13%。農業產量在1917到1921年間進一步下降了16%。鋼產量只相當於1913年產量的5%。

1921年和1922年饑荒遍佈俄羅斯的東部和東南部，導致了500萬人死亡，並使孤立的社區變得野蠻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1917年的革命勢頭變成絕望，這把社會轉變成需要為生存而嚴酷鬥爭的社會。

在這樣的條件下政治民主無法得以繼續維持。每一樣所需要的資源和人力都要求通過嚴格的集中制進行指令控制。此外，一場革命的內戰不僅需要在軍事前線戰鬥，而且同樣需要在後方對抗支援反革命的社會集團。

十月革命依賴于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農民支持工人國家是因為它給與了他們和平和土地。然而戰爭的損失腐蝕著農民對革命的支持。工業品變得極其缺乏，而同時需要從農民那裡強徵食品以供應紅軍和城市。只是由於白軍的野蠻和他們企圖將土地交還給地主阻止了大部分的農民走向反革命。

當社會分裂而工人階級的統治岌岌可危之時，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已不能得到維持。敵對分子在群眾中四處煽動不滿可能使整個國家引向叛亂的深淵，並為反革命敞開大門。對此托洛茨基解釋道：

「我們正在進行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新聞出版不是抽象的社會工具，而是兩個不可調和的武裝的互相對抗的對立面的武器。我們消滅了反革命的新聞出版，就如同我們摧毀它的據點、它的物質儲備、它的通訊系統和它的情報系統一樣。」（《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第80頁）

這段時期就是人們所知的「戰時共產主義」。在經濟上，全國的消費品極度缺乏，因而必須嚴格地控制。同時，出於對德國工人階級勝利的期待，蘇維埃政府希望直接從對分配的管理過渡到對生產的管理，而把戰時共產主義作為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起點。

改良主義者和前馬克思主義者對布爾什維克被迫採取的粉碎反革命的殘酷手段提出強烈抗議。他們問在布爾什維克和舊的沙皇專制的手段之間有什麼不同？托洛茨基回答：

「你們對此不理解嗎，聖人們？我們會向你們做出解釋的。沙皇的恐怖扼殺了工人們為社會主義秩序而進行的鬥爭。而我們的「肅反委員會」槍決那些為重建資本主義秩序而反撲的地主、資本家和將軍。你們把握了這些差別了嗎…？是嗎？對我們共產主義者來說這些差別完全是足夠的。」（《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第78頁-79頁）

然而鎮壓被布爾什維克看作迫於近在咫尺的反革命危險才使用的臨時的和特別的手段。即使在這樣危機的條件下，他們仍然保持對政治反對派和解的態度，只要他們在實踐中支持工人國家，並在此基礎上為他們的政策進行鬥爭。

在任何時期布爾什維克都沒有提出「一黨制國家」的概念，因為在馬克思主義中無法找到其相關來源。

然而，在實踐中那些支持革命的人大多數都加入了布爾什維克。而反對黨日益徹底墮落成為工人國家的敵人。他們鬥爭過並失敗了。

由於參與反革命活動，在1918年6月蘇維埃從開除了右翼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

直到1920年8月孟什維克還可以在莫斯科舉行他們的黨代會，並且得到了媒體的報導。但到了1921年，大多數孟什維克領導人離開了俄羅斯而在國外領導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運動。

1921年的共產黨代表大會認識到需要重建工人民主。但工人民主的基礎——工人階級的統一、組織和革命能量——卻被為贏得戰爭所需要的超人的精力耗竭了。



工業的崩潰意味著工人大軍的消亡：

「到 1919 年產業工人的數量下降到 1917 年水準的 76%…… 到 1920 年總的來說產業工人的數量從 1917 年的 300 萬人下降到 124 萬人，即還不到 1917 年的一半。在兩年間彼得格勒的工人階級的人數下降了一半。」（艾倫-伍茲（Alan Woods）和泰德-格蘭特（Edward 「Ted」 Grant）合著的《列寧與托洛茨基：他們真正代表什麼》（Lenin and Trotsky: What They Really Stood For），第 75 頁）

工人階級的政治幹部——曾經動員他們的工友、組織罷工、拿起武器，創造和領導蘇維埃的具有階級覺悟的積極分子——幾乎被完全消滅。正如伊林-詹涅夫斯基（Ilyin Zhenevsky）在戰爭開始時在彼得格勒的記錄：

「前線需要增援——包括普通的紅軍士兵和領導人員……彼得格勒委員會派了 300 人（我們黨的優秀成員）。我們不得不犧牲我們最好的力量以滿足前線的要求。（《掌握政權的布爾什維克》，第 116-117 頁）

數以千計的革命幹部在戰爭中犧牲。大多數倖存者被工人國家的政府部門所吸收。工廠中保留的勞動力轉變成 1917 年革命先鋒隊的對立面。早在 1919 年一位參加工會代表大會的代表就警告說：

「我們觀察到在大量工業中心裡的工人是從農民群眾中吸收進來的，我們得到取代工人的人口，仍然是半個農民的工人，甚至有時完全就是農民。」（同樣引自伍茲和格蘭特的作品，第 75 頁）

由於具有階級覺悟的工人的死亡和消失，而使用不成熟的半農民勞動力代替，並在工廠中用破舊的設備晝夜不停地生產和面臨持續的短缺，蘇維埃停止了運轉。

全俄蘇維埃大會原定是每 3 個月召開一次，而 1918 年全年只召開了一次，即使這樣召開的會議也沒有得到充分的準備。

由於極度的疲勞，令群眾不再有能力直接行使權力。這一點對俄羅斯工人國家的墮落起著決定性作用。

然而可能有人問：難道布爾什維克不能保持國家仍然是執行工人階級政策的工具嗎？他們掌握權力——為什麼他們無法剷除官僚主義並執行社會主義的政策？

這個問題同樣對澄清另一個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就是為什麼直到今天如果沒有群眾性的工人階級參與管理一切國家機關，真正的社會主義政策不可能出現。

下面三個章將在更多細節的基礎上審視布爾什維克面對的客觀障礙和由於缺乏正常運作的蘇維埃的條件下控制國家機器的局限性，以及共產黨自身變化產生的影響。

## 6. 官僚和工人國家

列寧在十月革命前不久就在他的《國家與革命》這本書中非常精彩地解釋了工人國家的特徵：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規模地擴大，使它第一次成為窮人的民主制度之外，…無產階級專政還要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採取一系列剝奪自由的措施。為了使人類從雇傭奴隸制下面解放出來，我們必須鎮壓這些人，必須用強力粉碎他們的反抗，…但這已經是被剝削者多數對剝削者少數的鎮壓。實行鎮壓的特殊機構，特殊機器，即「國家」，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過渡性質的國家。（《國家與革命》第 107 頁-110 頁）

作為一個特殊的進行鎮壓和統治的正在「消亡的」或者「萎縮的」機關國家——把武裝的人從人民群眾中分離出來，——是工人統治的政治措施。列寧總結了這一點的含義：

「自然，剝削者沒有極複雜的機器就鎮壓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鎮壓剝削者卻只需要有很簡單的「機器」，即幾乎可以不要「機器」，不要特殊的機構，而只需要有簡單的武裝群眾的組織（如工兵代表蘇維埃，……）。」（同上，第 110 頁）

在實踐中這個「簡單的機器」是如何工作的？勞動者如何才能掌控他們創造的國家並防止軍事和官僚精英的增長呢？列寧的基本準則在今天仍然像當年寫下的時候一樣適用：

- 「1. 任何官員的工資不得高於熟練工人工資的平均水準……」
- 「2. 管理職責需要在人口中的最廣泛階層中輪流行使以防止一個牢固的官僚等級的形成。」
- 「3. 所有工人攜帶武器保衛革命對抗來自內部和外部的任何集團的威脅。」

「4. 所有權力都由蘇維埃賦予。蘇維埃由來自工作場所的代表組成。這些代表可以被隨時召回，而且代表們被要求在他們工廠的群眾會議上向工友們彙報參加蘇維埃會議的情況……這樣保證廣泛的群眾參與。」（羅格-西爾弗曼（Roger Silverman）和泰德-格蘭特（Edward 「Ted」 Grant）的《官僚主義還是工人的權力？》第3頁）

革命摧毀了舊的沙皇國家，並在政府高層和軍隊內清除最反動的將軍和貴族。只要可能，共產主義者想法取代他們的位置。

但是對處在孤立中的蘇聯所擁有的資源條件下，國家機器徹底的轉變是不可能的。1917年2月布爾什維克只有23,600名。而其中只有少數構成了這個黨的幹部，領導其他人為黨的政策進行鬥爭。另一方面，國家機器有多達數十萬的官員。

舊政權中的「專家」和熟練行政人員無法被替代：他們不得保留，甚至需要以特權賄賂他們為代價。例如在1918年維亞特卡市（Vyatka，現名基洛夫市）裡，在4766名官員中至少有4476名就是以前為沙皇政權服務的官員。

托洛茨基在他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解釋了當時所發生的重要影響。

工人國家，他說，是「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座橋樑」。它的任務是通過有計劃的使用資源，創造一個富足的社會；通過這一階段，階級差異——與作為階級統治的機關國家本身——將會消失。

在第一個階段，工人國家必須通過使用它從資本主義處繼承而來的經濟手段進行運作。它必須使用經過資本主義制度訓練出來的有技術的人員和一些資本主義的方式運行：勞動分工、支付報酬，等等。

於是整個工人國家的發展可以歸結由「資本主義傾向和社會主義傾向之間的關係變化」所決定的。（《被背叛的革命》第54頁），——即舊的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殘餘因素與它自上而下的控制方式和工人階級自下而上的管理方式的發展（兩者間關係所決定的）。只有工人在社會中不斷增加的權力才能清除資本主義的殘餘。

然而在落後的俄羅斯，蘇維埃不再作為武裝的人民的機構而存在。日復一日管理權落入非共產主義的官僚大軍手中，並再次表現出成為社會中特權階層的前景。

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一個落後國家的官僚是其本身落後的產物——工人階級的軟弱、缺乏技巧以及政府官僚在政權中享有的地位：

「官僚統治的基礎是社會缺乏消費品，因此便引起了你爭我奪的鬥爭。如果商店裡的貨物充足，購買者就可以隨時去買。如果貨物很少，購買者就不能不排隊。而在隊排得很長的時候，就必須指派一個警員來維持秩序。這就是蘇維埃官僚的權力的起點。它「知道」什麼人可以得到東西，而什麼人必須等待。」（《被背叛的革命》第112頁）

因此，在一個孤立而落後的工人國家中，官僚並沒有簡單地變成多餘或「消亡」。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不發達」的工人階級無法接管官僚的功能，所以官僚取得——至少在一個階段內——其存在的客觀基礎。

通過官僚，反動階級的壓力在俄羅斯工人國家之上和之內得以充分發揮。日益明顯的是由於蘇維埃的筋疲力盡使得官僚有更多的自由為所欲為。在共產黨內組織的工人階級的政治代表們日益陷入艱難的對抗官僚的行動中。

列寧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裡為疾病所折磨，他敏銳地意識到了這種形勢的威脅。在1922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他對國際代表作出了如下對俄羅斯的狀況的坦率評價：

「毫無疑問，我們過去幹了而且將來還會幹出許多蠢事來。…為什麼我們會幹出蠢事來呢？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第一，我們是個落後的國家。第二，我國的教育程度極低。第三，我們得不到外援。沒有一個文明國家幫助我們，相反地，它們都在反對我們。第四，由於我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過錯。我們接收了舊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這是我們的不幸。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常常反對我們。…現在我們有一大批職員，但是缺乏有相當真才實學的人來切實地管理他們。」（列寧《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第19頁）

關於「真才實學的人」，列寧指的是共產主義工人，有組織的而且能夠控制那些「專家」。列寧無法對這一問題提供立竿見影的解決方案，因為在俄羅斯一國之內沒有這樣的方案存在。

列寧說過：「在我們的一切鼓動之中，……必須解釋說：……我們遇著的災難乃是一種國際的災難，若

非國際革命便無從解決。」(引自托洛茨基的《俄國革命史》)

換而言之，只有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掌握政權，並向他們在俄羅斯的兄弟姐妹提供大量的技術援助，才能清除官僚政權的基礎。

## 7. 黨內民主

蘇維埃工人階級的精疲力竭使得共產黨及其領導層有了一個關鍵的責任——保衛革命的成果。

戰爭環境摧毀了蘇維埃——工人國家的基本機構。到了 1921 年，甚至蘇維埃大會執行委員會每年也只舉行 3 次會議。人民委員會 (Sovnarkom，或者說政府) 作為國家政權的有效機關而得以保留。

人民委員會由選舉產生的負責領導的共產黨員組成，以執行黨的政策。自然他們也在黨的紀律下行動。

換而言之，黨作為工人國家的核心和支柱得以保留下來。權威必要地集中在中央委員會的手中，其後集中到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的政治局手中——這種極端的集中是戰爭的後果。

托洛茨基在 1920 年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以與波蘭簽訂和平條約為例說明這種情況意味著什麼：

「誰決定這一問題？我們有人民委員會，但是它必須被有效地控制。誰的控制？是由作為混亂而無組織的群眾的工人階級進行控制？不是的。是黨的中央委員會被召集起來以討論提議和決定是否作出回應。」(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 (E. H. Carr) 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226 頁)

雖然權力集中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而且他們立場堅定；但並沒有退化為自上而下的系統化的官僚體制。

黨和其幹部是通過鬥爭把大量分散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而組建的，它們都圍繞著一個馬克思主義綱領，但有各自自己的領導層和理念。建立的方法是討論。成員和團體(「派別」或「傾向」)的權利得到絕對的保障，他們可以向領導層提出疑問，並在有組織的條件下宣傳他們的理念。

例如，在 1918 年「左翼共產主義者」反對派在黨內關於是否與德國簽訂和約的尖銳辯論中脫穎而出。有兩周他們在彼得格勒發行自己的日報，在莫斯科他們贏得對當地黨組織的控制。然而當內戰開始後，左翼反對派和黨的其他群體一起全部投入鬥爭中。

伊林-詹涅夫斯基 (Ilyin Zhenevsky) 很好地描述了早期工人民主得以無限制的膨脹的情況：

「人民委員[部長]……在很多時候不是發出命令而是向他的下級行政機關提出請求。而這個機關本身可能不同意人民委員的意見，而拒絕他的請求。這種事情是經常發生的。在政務處理上廣泛的民主主義表達為權力在基層這樣的口號。」(《掌握政權的布爾什維克》，第 30 頁)

即使在紅軍中，批評托洛茨基領導的——基本上是遊擊戰支持者——也能組織他們自己的「軍事反對派」，並為他們的觀點進行宣傳。最終他們被爭論和事例所擊敗。

在 1920 年後期出現了所謂的工人反對派。其綱領被卡爾 (E. H. Carr) 概括為「當前各種不滿的大雜燴，主要是旨在反對日益集中化的經濟和政治控制」。(《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第 203 頁)

他們的觀點在黨的出版物上得以發表，日復一日，持續了幾個月。說明他們想法的手冊得以在 1921 年 3 月的黨代會上傳閱，在會上這些問題得以廣泛討論。

但是大會的議程卻戲劇性地被喀琅施塔得海軍要塞的水兵叛亂所中斷，喀琅施塔得是芬蘭灣裡面向彼得格勒的一個海島。

### 喀琅施塔得叛亂

1917 年喀琅施塔得水兵戰鬥在革命的最前線。到了 1921 年那一代人去了戰爭前線而被入伍的農民所取代，新的水兵在政治上缺乏經驗並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被農民的怨恨所影響，他們要求更大的自由卻無法提出解決這個國家問題的綱領，並在「打倒布爾什維克暴政」的口號下進行武裝叛亂。

這對於工人國家來說，比起當時散佈國內各地的武裝叛軍聯合起來表現出更嚴重的威脅。喀琅施塔得控制著彼得格勒的交通要道。一旦喀琅施塔得不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彼得格勒將無法進行防禦。這給與了白軍和帝國主義者攻擊革命關鍵中心獨一無二的機會。

當時芬蘭灣仍然封凍著，由重炮和波羅的海艦隊守衛的要塞而堅不可摧。解決這場危機的時間非常短。

海員拒絕投降。受到黨的領導層一致支持的托洛茨基發出進攻的命令。在數天的殘酷戰鬥後，喀琅施塔得被布爾什維克的部隊所奪取。

蘇聯的生存再次命懸一線。這種叛亂會蔓延嗎？對於黨代會上的代表來說，清楚的是一個聯合起來的堅固領導層是必需的。在這時黨內公開的分歧會被敵人用來迷惑工人和農民。因此決定黨內有組織的派別必須解散。

列寧在一年後概括了這一前所未有的立場的基礎：

「如果我們不回避現實，我們必須承認當前黨的無產階級政策不是由其成員所決定的，而是由一個由被稱為「黨的老衛士」的小團體的聯合的巨大威信決定的。在這個團體中極小的衝突即使不足以摧毀它的威信，也將在所有事件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威信從而讓這個團體失去決策的權力。」（英文版本《列寧全集》，33卷，257頁）

其中關鍵的詞語是「目前」。布爾什維克知道問題無法單獨通過組織化的措施解決；在更長的時間裡，統一只能建立在討論、教育和共識的基礎上。否認自組派別的權利只有在處置迫在眉睫的危機時作為緊急措施是正當的，而一旦形勢再次得到控制時就應立即予以廢除。

## 8. 共產黨內的權力鬥爭

喀琅施塔得叛亂顯示出農民由於戰爭時期的犧牲、物資短缺和強加的強制徵用而產生爆炸性的憤怒。當時，西方工人階級革命沒有立即實現重大突破的前景。很明顯，如果這個國家繼續實行軍事共產主義，就不可能不冒著發生大量叛亂的風險。

列寧，用一個簡單的例子概括了這一形勢：

「如果我們能夠明天就提供 10 萬台一流的拖拉機（並提供它們需要的汽油和機械部件）……………中農們就會說「我支持共產主義。」但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首先必須擊敗國際資產階級，強迫他們給我們這些拖拉機。」

（1919年三月18日到223日的俄共（布）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6. 農村工作的報告》）

1921年3月的第十次黨代會看不到任何除了廢除戰時共產主義的其他選擇（最初由托洛茨基在前一年提出）並採納了所謂的「新經濟政策」——一系列對主宰農業生產的資本家和富農的讓步。用市場的利潤刺激他們市場提高產量，作為供應城市和復蘇工業的方式。

新經濟政策毫無疑問成功地激化了部分經濟。到1922年工業產出達到1913年的25%，儘管主要在供應農民需求的輕工業領域。

在另一方面，新經濟政策造成工人向著集體化和經濟的中央計畫關鍵轉變的嚴重退步。它極大地增強了所謂的「新經濟人」——一代中間人，利用持續性的短缺來投機而填滿自己的口袋。

俄羅斯社會的力量天平越來越不利於工人階級。富農和新經濟人與國家官僚分享了部分特權。這些階層變得越來越自信並決定鞏固他們的地位。他們對工人領袖的壓力越來越大。

維克多-瑟爾基描述了這一扭曲的現實：

「階級分化在我們的眼皮下重生：在等級的最下層，失業者每月領取24盧布；在頂層，工程師領取



800 盧布；在兩者之間，黨的公務員領取 222 盧布，但卻可以獲得許多免費的東西……這裡有極端的痛心疾首的貧窮而富人們卻傲慢和自滿……年輕人酗酒、老人酗酒、而酗酒變成瘟疫。最糟糕的是我們不再能認識這個當初革命的黨了。」（《從列寧到史達林》）

官僚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不夠成一個階級（即一個在生產系統中發揮必要作用的社會集團）。它已經退化成一個寄生階層，利用技能的短缺來索要特權。

不可避免的是在國家機關中得到加強的「傲慢自滿的官僚」和還活著的布爾什維克幹部之間的緊張關係的加劇。當權力還保留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時，官僚無法安心。一場對共產黨控制權的鬥爭在這種局勢下產生。

在黨內的馬克思主義幹部由於公共事務的需要把能力用到極點，而黨的隊伍卻被大量湧來的新成員充滿。黨員從 1917 年二月的 2.36 萬人增加到 1918 年初的 11.5 萬，而在 1922 年 3 月增加到 65 萬。

許多當初入黨的人（特別是在內戰的黑暗時期）是充滿戰鬥性的工人和被這個革命黨吸引的年輕人。然而慢慢地，為實現他們政治野心的尋找新工具的前孟什維克、官僚、新經濟人和其他敵對因素開始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到共產黨。

早在 1919 年 3 月的第八次黨代會就認識到了這一危險：

「並不夠格的共產主義者甚至是完全「寄生」的人大量進入黨。俄羅斯共產黨掌握權力，因而不可避免地吸引（不光是相對優秀分子，同時也包括那些為個人履歷而鑽營的分子……）」

「在蘇維埃和黨組織進行一次嚴肅地清洗是不可避免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第 212 頁）

黨的內部鬥爭在戰爭時期發生在幕後。清洗最終在 1921-1922 年進行。不像後來對反對派的野蠻的官僚主義的攻擊（同樣被稱為「清洗」），它由基層黨組織的黨員認真考察，通過觀察黨員的付出和活動發現誰才是共產主義者。

第八次代表大會另外決定在 1920 年 2 月建立工農監察委員會（「Rabkrin」），其任務是和「蘇維埃機構中的官僚主義和腐敗」作鬥爭。

大會指定約瑟夫-史達林（一個老黨員，雖然不是理論家卻是很好的組織者，其在黨外幾乎不為人知）為管理新部門的人民委員。在 1922 年史達林被任命擔任另一個重要的管理職位：總書記。

Rabkrin 完全失敗。實際上它的成員，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是由「在其他領域失敗的工人」組成的。或者如列寧評論的：「最好的工人都前線去了」（《布爾什維克革命》第 232-233 頁）

然而有更多根本性的原因使得官僚主義腐蝕的趨勢無法遏制。

俄羅斯的落後反映到政治上是無產階級（在國內和國際問題上）相對於農民和反動階級的軟弱。正如列寧指出：

「只要我們還是一個由小農組成的國家，在俄羅斯資本主義就有比共產主義更堅固的基礎。」（《聯合的反對派的舞臺》第 6 頁）

蘇維埃工人階級的社會弱點無法通過行政手段克服；國家機器中資產階級的壓力無法通過另建一個新的官僚體系來清除。解決方法只能是通過國際革命的有利條件下的工人階級的政治重生。

官僚的影響日益遍佈黨內。許多共產黨員被複雜的行政工作吸收，已經被官僚所「領導」。

即使黨的領導層也在壓力之下採納對官僚的「實際」要求，把精力集中到通過組織手段在俄羅斯建立穩定而把世界革命扔到腦後。

列寧，在他政治生命的最後時期，變得日益地擔心官僚權力的危險。在 1922 年的 11 屆黨代會（他最後一次參加的黨代會）上，他發出這樣的警告：

「[[國家]機器拒絕服從領導它的手。正如一輛不是向司機希望的方向而是向其他人希望的方向行駛的汽車。他被一些隱秘不遵守法律的手駕駛……或許是一個投機者，或者一個私人資本家或者兩者都是。」（英文版《列寧選集》，33 卷，第 279 頁）

史達林在這一時期走上前臺。不是由於他個人的人格和能力，甚至不是由於他刻意為之，把這樣一個無特點的個人轉變成後來的獨裁者。史達林贏得權力完全是社會和國家中力量平衡變化的結果。

工人國家的官僚開始孤立「社會主義趨勢」，工人的領導層的墮落因素是它的政治弱點。史達林對於官

僚來說是一個「表現一貫而可信賴的」的關鍵官員。正如托洛茨基解釋的：

「（史達林給官僚）帶來了所有需要的保證：老布爾什維克的威信，堅定的性格，狹窄的視野，和國家機器的緊密聯繫……新統治階層的小資產階級態度也是他自己的態度。他深信建立社會主義的任務本質上是一國的和行政性的。」（《被背叛的革命》）

內戰帶來的罕見的權力集中對於官僚來說是政府自然的管理方法。這給他們提供保護他們的特權不受未來工人階級控制威脅的手段。

史達林在將黨機關內任職的官僚糾集起來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從 1922 年開始，他系統性地把他的追隨者任命為支部、地區和省級的書記。這使他得以有效地控制日常政治實施、會議組織、黨代會代表的選舉的。

這些詭計為他與列寧、托洛茨基和其他殘餘的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的正面衝突鋪平了道路。

## 9. 轉捩點

1923-1924 年見證了在蘇聯內的一個轉捩點：國家和黨內的矛盾爆發成為決定性的政治鬥爭。

在一系列中風後，1922 年底列寧病情十分嚴重。已經不能確定他何時或者是否能重新進行政治活動。

官僚敵視和擔心托洛茨基——在黨內僅次於列寧最具權威和最堅定的馬克思主義領袖。然而一些「老布爾什維克」領導者——被政治短見、個人野心和忠誠，他們不願看到由於列寧的缺席托洛茨基取代列寧在政治局的領導地位。

在 1922 年 12 月，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主席）和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的緊密合作者）和史達林組成一個秘密的派別（後來被成為「三人團」或「三人領導小組」），其明確目的是密謀反對托洛茨基。這給了他們在 6 人組成的政治局一個有效的多數，成為中央委員會和整個黨的領導權威。

是列寧，在他的病床上首先感覺到發生了什麼，並展開了與史達林和官僚的鬥爭。

1922 年 11 月 25 日列寧在一張便條（後來被稱為他的「遺囑」）上寫道：「史達林同志成為了總書記，在他的手中集中了無限的權威，而我不確信他是否能總是足夠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

十天後他補充道：

「史達林太魯莽，這一缺點雖然在我們共產主義者中間當然能夠接受，然而作為總書記這一缺點是無法容忍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建議同志們考慮讓史達林離開當前的職位而讓其它的同志代替，那個同志只需要比史達林多一個優點——更具有容忍心、更忠誠、更禮貌、更多的考慮其他同志，不是那麼反復無常等等。這種情況或許表現為一個可以忽略的細節。但是我是從防止分裂的角度考慮的……這不是一個細節問題，也不是一個想像成決定性因素的瑣事。」（《列寧選集》）

列寧擔心史達林是否能夠勝任，但並沒有寫出什麼是「決定性因素」。但是這除了意味著他認為史達林會和黨內馬克思主義最好的代表衝突，而發現自己成為敵對力量——富農、官僚、「資本案」和「投機者」——的工具外，還能有什麼？

只有這一點才能解釋為什麼列寧要求在任命史達林為總書記之後這麼快要求他離職。

然而列寧臨近死亡，史達林和他的派別變的日益傲慢，濫用他們的權力違反一切黨的傳統。

1922 年 1 月 30 日史達林官僚把格魯吉亞蘇維埃共和國正式納入蘇聯並對當地布爾什維克領導進行鎮壓。當列寧發現發生了什麼的時候感覺到反對黨內異化趨勢的鬥爭不能再推遲了。

由於重病無法參加 1923 年四月的第 12 屆黨代會，列寧託付托洛茨基為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辯護並發出反對史達林的「爆炸新聞」的任務。

然而史達林退卻了，接受了所有托洛茨基的批評並糾正了他在民族問題上的表述。托洛茨基由於這一點不情願在發起對史達林的公開攻擊。因為其可能被看作爭奪列寧位置的「權力鬥爭」並有可能產生分裂黨的危險。

這樣對抗就推遲了。不久之後列寧再次中風而從政治活動上消失直到他在 1924 年 1 月去世。

此後數月在黨內爆發了關於兩個核心問題：黨的民主和經濟政策。

在大會上托洛茨基描述了新經濟政策整體狀況。並指出在工業生產方面存在的危險。他用一幅工業和農業價格變化的示意圖才說明他的觀點。其表現為一把張開的剪刀：農業價格是一條下降的線，而工業價格是一條上升的線。

到了 1923 年 3 月，工業價格達到 1913 年水準的 140%，而農業價格下降到不到 1913 年的 80%。這一問題後來被稱為「剪刀差」。

如果工業產值持續下降而價格持續上升，托洛茨基警告道，農民和無產階級之間，農村和城市之間的分裂將是不可避免的。

大會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要在新經濟政策框架下進行一個新的變化的意見；在中央計畫的基礎上發展國有部門並擴增工業，最終吸收和消除私有部門。

然而這一政策變成一紙空文。和「私有部門」存在共同特權的官僚不希望去虛弱它。實際上他們和以前一樣依賴富農由於利潤的刺激提高產量。

在 7 月和 8 月發生了罷工潮，工人們發洩他們對他們的嚴酷環境的不滿。其中的領導者——許多老布爾什維克——被官僚下令逮捕。所有這一切都顯示出黨內的不健康達到了一個危險的水準。

托洛茨基發出了警告。「關押反對派，」他解釋道：「不能解決任何事情，衝突的原因仍然存在：缺乏經濟控制，在黨之上的官僚控制。」

「當前的政權」，托洛茨基在 10 月 8 日向中央委員會寫道，「比戰時共產主義的極端時期更加遠離任何工人民主。」（《1923 年反對派檔案》，第 2 頁）從上面任命的書記們組成的等級「捏造黨的觀點」，支配普通工人，並確保批評觀點不會被真正聽到。

在托洛茨基抗議的日子裡，一項聲明被其他 46 名黨的領導成員發出，表達了他們對政治局方針的批評和多種糾正它的提議。

維克多-瑟爾基（1923 年反對派成員），解釋了他們的普遍觀點：

「這個國家接近一場無可挽回的危機，這場危機可能導致 1.2 億農民起來反對社會主義政權，在外國資本的仁慈下取代它的是強迫該國進口（靠貸款？什麼條件下的貸款？）大量工業品。為了防止這場危機，必須在為時已晚之前採取措施。」

這些措施是：

- （1） 重建黨內的民主，這樣工人的影響才能感受到；公開討論國家機關。這是任何經濟措施成功的顯而易見的條件。
- （2） 採納工業化和在未來數年相當程度地重建工業的計畫。
- （3） 為了給工業化提供足夠的資源，強迫富裕農民把他們的糧食交給國家」（《從列寧到史達林》第 40 頁）

這使得黨內鬥爭的分界線變的更加清楚。這是一場對立的社會力量之間的鬥爭：一個是基於工人階級的趨勢，另一個保衛「勤勞小農」和特權集團。

「三人團」和他們的支持者由於挑戰陷入混亂。46 人的聲明打破所有黨的先例而遭到禁止，而托洛茨基被指責「發起」了這項聲明。

然而在黨的大多數的壓力下（包括軍隊和年輕人），官僚被迫退卻。他們在紙上接受了反對派的要求，宣佈一個在黨內自由和民主的「新方向」，同時把權力的韁繩緊緊握在手中。

托洛茨基在 11 月 8 日的對黨員的公開信中警告紙上的「新方向」是不夠的，黨不能回到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道路上除非普通工人——特別是年輕人——採取行動「改進和修復黨的機關」。（《新方向》，第 71 頁）

這封信在黨的工人中激發了巨大的熱情——而對於官僚來說卻是宣戰。爭論將在 1924 年 1 月第 13 屆大會上解決。

然而蘇維埃政黨內部的鬥爭被 1923 年在德國的發展決定性阻斷。



## 10. 德國革命的失敗

德國易碎的穩定在 1923 年 1 月法國軍隊佔領魯爾工業區後破滅。在法國軍隊的槍口威脅下德國帝國主義者被勒索「戰爭賠款」作為他們在世界大戰中失敗的代價。

德國的經濟跌入低谷。已經在 1922 年直沖雲霄的通貨膨脹在 1922-1923 年間變成了一個天文數字——大約增長百分之 1,000,000,000,000!

工人和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急劇下降。工人階級急劇地向左轉。工廠委員會和改良主義工會領導對立起來。德國共產黨增加了幾萬人。「無產階級百人團」（工人武裝）成立，到了當年秋季就吸引了 6 萬名工人，而且擁有 1.1 萬支步槍（根據資本家的估計）。

在薩克森和色林吉亞兩個州，由於德共的支持左翼社民黨政府掌握政權。

8 月 11 日的大罷工推翻了柏林的右翼的古諾政府。德國處在革命的關口。

工人的領導層沒有做好準備。德共的領導層分裂成「中間派」、「左派」和「右派」，而把謹慎的布蘭德勒 (Brandler) 作為黨首。優柔寡斷和變化無常成為政策的特點。

共產國際日益被蘇維埃黨內的鬥爭所影響。官僚的保守和短視開始通過蘇維埃黨的領導層傳播到各個地方。

共產國際在德國的代表拉狄克 (Radek) 全力支持布蘭德勒。直到 7 月史達林還建議「德國人應該保持克制而不要衝動」。(《1923-1924 年間的空位期》(The Interregnum 1923-1924) 第 195 頁)

直到古諾政府倒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ECCI) 才採納了托洛茨基的意見——奪取政權的鬥爭在德國的議事日程之上，需要為武裝暴動做政治和組織上的準備。

然而可悲的是這一政策並沒有被貫徹。托洛茨基概括了所發生的：

「為什麼德國革命沒有成功？失敗的原因完全出在策略上，而不是當時存在的社會條件上。這就是一個沒有被把握住的革命形勢的經典的例子。德國無產階級在最近幾年經歷了所有的這些事情之後，只有當它確信這次問題能被決定性的解決而且共產黨在為鬥爭作準備並能贏得勝利它才能被引向一個關鍵性的鬥爭。然而共產黨延遲很久後才進行這一轉變[暴動]並且非常不堅定。直到 1923 年 9-10 月，不僅右翼而且左翼……都對革命的過程報悲觀的觀點。」(《列寧之後的第三國際》第 70 頁)

三人團無力在德共的領導層中干涉和指導一個當時的形勢下的大膽的革命化覺悟。托洛茨基被刻意孤立。後果是災難性的。正如托洛茨基的一個親密合作者在 1936 年寫的 (特地-格蘭特 (Ted Grant) 的《第三國際的興起和衰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第 28 頁)

當德國的資產階級至少開始集中力量，宣佈緊急狀態和準備採取攻勢時，德國共產黨去無所作為沒有進行鬥爭——甚至取消了起義。(投降屈服的消息沒有及時傳達到漢堡，所以當地發生了一場孤立的起義，而在戰鬥幾天後被鎮壓。

德共領導層的失敗讓德國工人階級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並讓歐洲革命失去了一個能夠改變世界歷史軌跡的勝利的機會。相反德共在隨後幾個月中被宣稱為非法黨派。在大量的美國援助之下，德國經濟穩定下來，資本主義從懸崖的邊緣被拉了回來。

而在幾個月之前，保加利亞共產黨群眾 (跟隨其領導層) 武斷地拒絕和農會組建聯合政府對抗右翼武裝政變。同樣在波蘭，被德國革命激發的工人抗爭也被挫敗。

這些惡化的局勢對在俄羅斯發生的黨內鬥爭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特別是德國被看作是歐洲革命的鑰匙。而現在清楚的是不再能指望未來數月或者數年會有來自西歐的援助。

一個惡性循環形成了。在官僚日益增長的對蘇維埃黨 (通過它，同樣對共產國際) 的控制成為了革命政策發展和國際領導層的嚴重阻礙。而其產生的後果又加強了能讓官僚盛行的當前的沮喪情緒和保守主義。

政治覺悟不夠的工人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革命的前景失去信心。對於工人中的落後階層來說，官僚的懷疑和譏嘲開始顯得「現實」。

「沮喪的情緒瀰漫了俄羅斯，」瑟爾基寫到，「而官僚平穩地統治了三年。」(《從列寧到史達林》第 42

頁)

**問題討論：**

1. 1918 到 1921 年間在德國，義大利的革命運動的失敗沒有預示俄國革命的過於早熟和註定失敗嗎？
2. 殘酷的「戰時共產主義」政權沒有為史達林主義準備好道路嗎？
3. 為什麼國家沒有如列寧預測的那樣在布爾什維克的統治下「枯萎」？
4. 對喀琅施塔得海員叛亂的鎮壓沒有顯示布爾什維克是極權主義者嗎？
5. 如果史達林這麼壞，那為什麼他成為了共產黨的總書記？

## 第三章：「一國社會主義論」

### 11. 「托洛茨基主義」的發明

黨的官僚操弄投票把反對派代表趕出 1924 年 1 月召開的俄共（布）黨十三大，而只有這裡才會決定黨內激辯的結果。

例如在莫斯科，反對派在多數支部得到了大多數支持。在地區選舉中即使被史達林委任的書記殘酷地清除左派反對派的支持者，左派反對派依然得到了 36% 的選票。然而，反對派在省一級的所得票數卻離奇地被進一步減半。

整個蘇聯只有三個反對派代表能夠參加會議！

在這之後就接到列寧去世的消息。工人和青年群眾就進一步感到沮喪不已，相對官僚立即就發覺到自己處在更有利的地位。

現在三頭馬車開始著手去挫敗左派反對派在黨的活躍分子中的力量。理論上作為向列寧致敬，他們把黨向工人開放——難道托洛茨基沒有批評過說事實上只有百分之十五的成員是工人？

1924 年 2 月至 5 月之間，大約有 24 萬工人被吸收入黨。事實上，這種所謂的「響應列寧的號召」，是對列寧發展起來的黨的建設方法的嘲弄。（譯按：《被背叛的革命》第五章二節）

正如 1919 年黨代表大會解釋：

「共產黨是只團結無產階級和最窮的農民中最進步的在其隊伍中的組織——即這些階級中自覺地為共產主義綱領的實踐而奮鬥那部分。

「在所有工人組織中共產黨給予自身的任務是贏得決定性的影響...」

大量新黨員充斥這個列寧的黨正正和這個任務相反——而此是另有目的。三頭馬車機關算盡這個「響應列寧的號召」會首先為他們提供投票的彈藥來消滅反對派。沒有經驗的黨員在面對陌生的問題時，往往會跟隨所給予的指導。很少新黨員會覺得能夠挑戰政治局。

和在俄羅斯的情況一樣，在國際間的共產黨內的左派反對派受到大力支持。例如，法國和波蘭具有群眾基礎的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都抗議對於托洛茨基的攻擊。

這三頭馬車對此無法容忍。季諾維也夫濫用自己作為共產國際主席的職位，無情地在「布爾什維克化」的口號下解散各國的共產黨的領導班子以排除托洛茨基的支持者！

然而即使這樣，只要作為理論家和十月革命的共同領導者而具有極大權威的托洛茨基繼續鐵面無私地依據馬克思主義批評他們的機會主義和大錯，黨的官僚老爺們仍會感到不安。這是季諾維也夫和史達林主義必須偽造歷史並把托洛茨基貶得一文不值的根本原因。（譯按：可見《史達林偽造歷史》）

他們的策略是發明「托洛茨基主義」（1923 年 12 月季諾維也夫創造的這個詞）。透過強調過去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的每一個差異以暗示托洛茨基「總是」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

托洛茨基被斥責為是孟什維克（在 1903 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令人困惑地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後數個月，他發現自己身在孟什維克陣營直至托洛茨基和孟什維克之間的政治分歧變得清晰），他也被斥責為極左分子！特別是以他的不斷革命理論來論證他的理論是對「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偏離」。

實際上，托洛茨基與孟什維克的根本分歧正是 1917 年及之後的他與列寧的政治聯盟的基礎。

托洛茨基這樣說明孟什維克：「所有俄國孟什維克的出發點是：只有作為政權的天然追求者的自由派資產階級才能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擔當起領導作用。按照這一圖式，無產階級政黨充當的角色只能是民主陣線的左翼。」（《不斷革命論》初版序言）

據此，革命應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民主主義」的階段（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只有在未來的某一時刻「社會主義」才能提上議事日程。

托洛茨基反對這種機械公式併發展出一個如俄羅斯這樣的落後國家進行的革命的特質的分析。這種

分析被十月革命光輝地確認，並以「不斷革命論」聞名於世。

「一旦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托洛茨基在 1906 年寫道：「政權就會轉到在鬥爭中起領導作用的那個階級手中，換言之，轉到無產階級手中...無產階級的統治地位同它在經濟上的奴役地位是不相容的。不論無產階級是在什麼政治旗幟下取得政權，它都必須走上推行社會主義政策的道路。」（《總結與前瞻》第五章和第八章）

他補充說：「如果俄國無產階級執掌了政權，它既會遭到世界反動勢力有組織的反對，又會得到世界無產階級有組織的支持...除了把本國革命與歐洲革命聯繫起來，俄國工人階級沒有別的出路。」（第九章）

列寧在 1917 年 4 月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到 1924 年，「不斷革命論」已經多年沒有成為論題，關於它的爭論已成歷史。但是對於黨官僚，黨對於革命的國際主義的承擔——由托洛茨基一馬當先所擁護的——正成為一個不可容忍的眼中釘、肉中刺。

隨著德國革命的失敗，顯然蘇聯要面對一個長期的孤立。對於官僚們而言，世界革命越來越變得是一廂情願的空想。他們漠視了西歐的工人階級，並定意去解決蘇聯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間生存下去的「具體」任務。

物質條件決定意識。在 19 世紀 90 年代，伯恩斯坦發展了改良主義的「理論」，為社會民主黨的右翼從現實生活中的階級鬥爭綱領上撤退提供正當性。

同樣地在 1924 年至 1925 年，史達林炮製了一個「理論」反映了蘇聯官僚的保守主義，來反對托洛茨基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並嘗試以「馬克思主義」術語來為自己與它的決裂提供正當性：該「理論」就是「一國社會主義論」。

## 12. 「一國社會主義論」

史達林從列寧的浩繁著作中引用了三段論述，在 1924 年 12 月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觀念，即社會主義可以在沒有發達國家工人階級的勝利的情況下在俄羅斯建成。

這種想法違背了列寧試圖解釋的一切，即使在史達林所引述的列寧著作中也是如此。列寧只不過說明在俄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政治條件（一個得到農民支持的工人政權）已被十月革命締造出來了。列寧在任何階段都沒有懷有經濟落後的俄國具備社會主義社會的先決條件這幻想。

遲至 1924 年 2 月，史達林仍然宣揚與「一國社會主義論」的完全相反的東西：

「...沒有幾個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努力，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要實現最後的勝利可能嗎？不，這是不可能的，一個國家的努力，特別是這樣一個農民的國家俄羅斯不足以取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生產的組織方式，幾個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努力是必要的。」（史達林《論列寧主義基礎》）

然而在幾個月後，史達林採取了完全不同的路線：

「如果我們事先知道我們不勝任建設這個任務（由俄羅斯單獨建成社會主義），那麼到底為什麼我們要發動十月革命呢？如果我們已經準備了 8 年，為什麼我們不準備第九年第十年或者第四十年呢？」（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一國社會主義》，第 2 卷，第 181 頁）

是什麼使史達林把他原來的思想推翻了呢？

基本上是力量對比的深刻變化鼓勵了非理論家的史達林敢於對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進行挑戰。當時反對派、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工人階級的要求被壓制，而越來越囂張的官僚正逐步邁向勝利。

國際性地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的思想（「不斷革命論」）對蘇聯的新主人而言完全是頭怪物。史達林對理論的徹底歪曲在字義上不是理論：嘗試解釋現實。它只是埋葬馬克思主義本身不斷革命理論的嘗試。

為了毀滅證據，官僚層日盛一日地「改造」黨的歷史和馬克思主義的教科書，使其向工人顯示他們的政策是一貫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延續。例如，到 1926 年 11 月，史達林認為可以宣佈：

「黨始終把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的勝利意味著在該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以及憑藉一個單獨國家的

力量可以完成這個任務的觀念作為出發點」！（由伍茲和格蘭特引用）

歸根結底，史達林的「理論」否定需要一個革命的國際組織。國際上共產黨的首要任務由通過世界革命建立社會主義，變成了保衛蘇聯的「社會主義」。

實際上這意味著對蘇聯官僚的利益和政策無條件的支持。（1943年，史達林本人也明確證實了這一點，他大筆一揮解散了當時已經是官僚空殼的共產國際，向他的戰時盟友：帝國主義領導人羅斯福和邱吉爾證明蘇聯領導層已經放棄了世界革命的全部思想。）

左派反對派對官僚粗疏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提出疑問，則被指責為「悲觀論者」和「憤世嫉俗者」。

實際上是反對派一直解釋工業化的需要以加強蘇聯工人統治的基礎。（對於這一點，他們卻反過來被譴責為「超工業化者」！）但他們還解釋說，這本身也不足以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另一方面，放棄國際主義綱領意味著抹殺任何真正意義上的重建俄羅斯的前景——即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歐洲的一部分。官僚的替代就是更加公開地依靠富農作為「國家」的經濟支柱。布哈林在1925年4月，竟脫口而出：

「對於農民...我們必須說：使自己富起來，開發你的農田，不用擔心會對你施加限制。」（引自愛德華·霍列特·卡爾《一國社會主義論》，第1卷，第280頁）這個口號因為它太露骨而遭到攻擊，而中央委員會不採用它，但這個總的思路成為黨的政策。

在這年完結前，史達林甚至考慮把土地去國家化！

這時，這三頭馬車開始崩解。它已完成它的任務。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加入了平庸的史達林的陣營是出於對托洛茨基的敵意。現在他們開始遠離幾乎擁有所有的權力的殘酷的史達林。

三頭馬車之間的政治差異現在開始浮現。

在1925年12月的黨代表大會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開始提出對史達林思想的疑問。但是，要建立決定性馬克思主義對一國社會主義論的反駁，並揭露其內在危險的任務則要交給托洛茨基了。

今天這個問題比起在20世紀20年代更為重要。當今強大的蘇維埃政權在國際間，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中的群眾運動中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一國社會主義論」的官僚哲學（或「社會主義的民族道路」），已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許多領導人的出發點。

托洛茨基對史達林的答覆仍然是回答這些想法最清晰的基礎，並提供了以馬克思主義前進的道路。

### 13. 為什麼馬克思主義代表國際主義

托洛茨基表明1924年之前布爾什維克黨內從未有向國際主義的綱領（現在被標籤為「不斷革命論」）提出異議。但是，史達林粗陋的挑戰使我們有必要再次從根本上來說明這個問題。

托洛茨基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開始。他解釋說文明是通過發展生產力來推進的——通過人們和階級在社會中為了滿足其物質需求而進行鬥爭，從而促進科學技術、政治和文化的發展。

社會制度在生產組織的基礎上存在。一個社會制度只有到其發展的極限，並且有一個重新組織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的新的革命階級準備好奪權才會退出歷史。

社會主義的必要性產生於資本主義制度對生產力進一步發展所創造的障礙。社會主義的歷史的目的是要超越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限制，以發展社會到更高水準的富裕程度和自由。

正如托洛茨基解釋說的「社會主義社會只能建立在最先進生產力的基礎上...結合、推廣和最大限度的發展已有的現代科技的最高元素...但是，社會主義不僅要繼承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生產力，而且必須立即把這生產力推向更高的位置...發展到資本主義不能想像的高度。」（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40-41頁）

換句話說，如果社會主義不表現能提供比資本主義能夠提供的更高的生活水準（或表現為倒退的話），那麼為結束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鬥爭和犧牲是沒有正當性的——而且對勞動人民群眾來說是沒有吸引力的。

為什麼社會主義改造能使甚至比資本主義的最高成就更高的飛躍進步成功呢？一方面，因為它使生產

擺脫了市場力量的無政府狀態、私有制的扭曲和民族國家的界限。另一方面，它從資本主義生產的壓迫性紀律下解放出了工人的集體智慧和創造性。

換言之，工人民主管理是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過渡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前提。

為什麼這樣的轉變不可能在一個國家的邊界內實現？正因為資本主義是作為一個世界體系發展起來的。「最先進生產力」不包含在任何一個單獨的國家中，它們取決於由世界貿易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一系列國家的工人階級的聯合努力。當然，它們不可能在一個如 1917 年的俄羅斯一樣不發達的國家存在。

社會主義轉變——控制最先進的生產力——只能是一個國際的進程，取決於至少一批工業化國家的工人階級奪取政權（這判定了世界範圍的資產階級死刑）。

只要工人統治仍然局限在一個國家，它將面對掌握著巨大的經濟和軍事資源的世界各國資本家的敵意。

史達林的看法粗疏，認為十月革命除了要在俄羅斯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標外沒有其他目標，以致完全忽略了重點。列寧對於這問題的許多論述其一就已經事先回答了史達林：

「單獨的俄羅斯無產階級不能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後勝利。但它可以讓俄國革命成為一個偉大的推進，它將會為社會主義革命創造最有利的條件，將在一定意義上說啟動社會主義革命。它可以創造條件讓它的主要的最值得信賴的和可靠的盟友歐洲和美國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可以更方便地加入決戰中來。」（《列寧全集》第 23 卷）

## 14. 「一國社會主義論」究竟是什麼？

蘇聯不能超越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前進，因為在其邊界內不存在「最高的生產力」。即使是基本的生存必需品也只能通過與帝國主義列強的貿易獲得。

眼前的挑戰是要趕上資本主義，佔領世界經濟的「制高點」，因此為作為國際性制度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基礎。換言之，蘇聯的根本弱點在於其較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的經濟和技術落後。落後是官僚化的根源（見第 6 章）；官僚統治排除工人民主，形成社會主義轉變的一個絕對障礙。

官僚堅持把革命的國際問題看作為本質上是軍事問題，並押注在蘇聯能夠打敗帝國主義未來的侵略上。

正如托洛茨基指出，即使是帝國主義的軍事威脅也是由於其技術優勢。但是，他補充說：「與其說是軍事的威脅還不如說是更便宜的商品對蘇聯構成直接的最大的威脅。」（《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第 37 頁）

換句話說：蘇聯群眾將捍衛自己已獲得的成果，並與公開的反革命威脅鬥爭。但因官僚統治而士氣低落和失望，他們不能指望去抵禦顯然能為他們提供優越的生活的資本主義敵人來保衛自己的落後。

事實上在 1941 年入侵蘇聯的不是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軍隊而是希特勒。希特勒的軍隊帶給俄羅斯群眾的是鐵絲網、可怕的奴隸勞動和滅絕人性的集中營，而不是「廉價商品」。

遭受納粹野蠻的種族鎮壓，英勇的俄國工人團結起來保衛蘇聯。

今天國際間的力量對比已大大地轉向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再也沒有任何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可能。官僚把巨大資源挪用到了軍事發展上，並把蘇聯轉化為一個擁核的超級大國。帝國主義侵略的威脅已經有效地被遏止。

但即使這個只可能在國有和計劃經濟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此壯觀的經濟發展，也不能克服一個由特權精英統治的俄羅斯社會所造成的扭曲。

官僚鎮壓扼殺由下而來的主動性。同時利用收買和強迫的手段來驅促工人前進。官僚的安慰說正以「蝸牛的速度」（布哈林語）建設社會主義像是在嘲弄工人的心願。

實質這全部意義就是要在一個落後的國家進行發展國有經濟的艱苦鬥爭——在他們的統治下。

早在 1845 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已預言為何社會主義不能在如下條件下建立起來：

「生產力的這種發展 ... 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汙濁的東西

又要死灰復燃。」（《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中文版），第 86 頁）

這一見解赤裸裸地被俄國工人國家官僚的墮落證實了。官僚只能建立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伴隨著不平等出現的是日益蔓延的腐敗和官僚機構一部分的員警鎮壓，在群眾中出現「人人為己」的嚴酷鬥爭。

來自一個集體農莊（集體農場）的職工在 1930 年 4 月寫的信，總結了新產生的勞動人民和他們的官僚主子之間的新的關係：

「集體農莊的成員有兩個月沒發工資... 百分之五十的收入到了集體農莊的國庫裡去了，剩下的百分之五十為稅收和租金。留給工人的是什麼呢？沒有人知道。集體農莊的主席每個月給自己幾張麵粉票，而同時免於所有的體力勞動...」

1930 年 3 月工廠的一個工人這樣說：「他們壓榨我們，情況如何呢！勞動生產率增長 25% 而工資增加只有 1.9%，3 年裡工資沒有變化，但生產率已經提高非常多。用五個人取代六個人工作，設備沒有變化。獎金制度適用於這樣一個情況... 每 6 個月應該支付，但在現實中沒有人能希望得到一個子...」（塞爾引自《從列寧到史達林》，第 60 和 61 頁）

社會主義不能建立在這種條件下。十月革命為社會主義的發展創造了必要的政治條件而官僚反革命破壞這個條件，需要重新創造這個條件：工人民主管理。

## 問題討論

什麼是托洛茨基主義？

不斷革命論不是一個破壞性的政策嗎？任務難道不該是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嗎？

如果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國內建立，那麼十月革命又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托洛茨基的分析是正確的，而史達林是錯的，史達林怎麼會擊敗托洛茨基呢？

國際主義是否真的只是不可實現的夢想？

## 第四章：官僚集團的反革命

### 15. 中國的悲劇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他們的支持者，1926年加入到托洛茨基和反對派的陣營中，希望共同奮鬥把黨從史達林日益反馬克思主義的進程中拉回來。

史達林和他的力量則加入到了極右翼親富農的布哈林為首的陣營中以實現擊敗聯合左派反對派的目的。

這場鬥爭為國際上一系列新的動盪而貫穿始終。

在英國，1926年5月的總罷工引發了一場深刻的危機。規模極小的共產黨獲得領導幾十萬工人反對改良主義總工會的機會，並準備將權力移交給工人階級。

但俄國史達林主義領導層機會主義地與英國總工會中的所謂「左派」相互勾結，而允許不發生針對他們的鬥爭。總工會中的右派一有機會就背叛了罷工，而史達林的「左派」盟友未做任何抵抗。

十天後，罷工仍在蔓延，但總工會理事會一致要求取消罷工，而向老闆們投降。這使英國工人階級陷入了歷史性失敗。

他說：「西方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瑟爾基寫道，「看起來失去了許多年，現在一盞巨大的明燈在東方升起；... 中國群眾正從勝利走向勝利。」（《從列寧到史達林》，第44頁）

中國工人階級正日益獨立於反動的蔣介石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國民黨。中共正在成為一個群眾性力量。上海和漢口在工人的手中。一場爭奪權力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同樣，史達林的機會主義阻擋在勝利的道路上。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領導曾對蔣介石懷有危險的幻想，並宣佈國民黨是「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和城市民主派[即資本家階級]組成的革命陣營，基於階級利益的社會基礎上... 在反對帝國主義和軍事封建統治秩序的鬥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1926年3月）

實際上，這意味著，共產黨不得不服從蔣介石的權威。這與舊的孟什維克思想，工人階級應該與「民主」資本家共同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為民主奮鬥有什麼差別呢？

左派反對派盡一切努力與這政策做鬥爭。他們解釋說，蔣介石正在捍衛資本家和地主，需要蘇維埃（工人）政府把土地分給農民和建立民主制度。

「我們知道，蔣介石正準備公開背叛工會和他的共產主義盟友」，瑟爾基寫道，「我們不被允許說話。史達林在莫斯科在成千上萬工人面前鄭重保證蔣介石沒有什麼可害怕。」（《從列寧到史達林》，第45頁）

蔣介石利用史達林給他的這個機會，1927年4月的野蠻屠殺共產黨人和工人。共產國際（在與所謂比蔣介石激進的「（國民黨）左派」勾兌後，而遭遇進一步的失敗），從而轉向極左過程，並試圖在廣州發動起義。而它在工農的鮮血中註定會失敗。

這些事件註定了中共作為一個革命的工人組織結束。

中國革命運動巨大地衝擊了國際。

「刺激橫掃了整個[蘇維埃]黨」，托洛茨基寫道。「反對勢力得以抬頭... 許多年輕的同志認為史達林的政策專利破產是必然帶來的接近反對派的勝利...」

我不得不在許多頭腦發熱的年輕朋友們頭上倒一桶冷水... 認為我們的預測已經證明是正確的事實可能會吸引一千、五千、甚至萬餘新的支持者。





但對於數以百萬計的群眾而言，重大事情是不是我們的預測，而是中國無產階級遭到鎮壓的事實。在1923年德國革命失敗後，在1926年英國總罷工失敗後，中國出現的新災難只會加劇群眾對國際革命的失望。

正是同樣的失望，成為史達林國家改良主義政策[即「一國社會主義」]的首席心理來源。「我的生活」，第552-553頁)

因此，官僚集團短視的機會主義造成的國際失敗同時強化了官僚集團，為孤立和馬克思主義反對派的失敗並創造了條件。托洛茨基解釋說：

「先進的工人無疑同情於反對派，但是這種同情是消極的。群眾不相信情勢可以因一次新的鬥爭而改變。同時官僚卻宣佈說：「為著世界革命，反對派想把我們拉入一個革命戰爭之中。震動已經夠了啊！我們現在有權利休息一下。我們要在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信賴我們吧，信賴你們的領袖吧！」這種休息的福音，……，並且無疑在疲乏了的工人之中得到應和，在農民群眾之中得到更大的應和。」（《被背叛的革命》）

## 16. 聯合左派反對派的失敗

在題為聯合反對派綱要（1927年）的主要檔中，托洛茨基製作了一份共產黨政府十年的資產負債表，以馬克思主義對比盲目的機會主義官僚政策。

該宣言呼籲復興蘇維埃，恢復工人民主，以及大膽的工業化綱領。在反對黨的壓力，官僚提出有限的五年計劃。但它是基於富農的利益，而忽視了工業發展的需要。宣言解釋了替代選擇：

「我們必須在各階級見重新進行稅收負擔的再分配——富農和新富階層應該承擔更多，而減輕工人和窮人的負擔...」

「我們必須引導朝著產業化、電氣化和合理化發展，以提高經濟技術實力，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條件為基礎。」

反對黨批評史達林災難性的外交政策，試圖追求「瞬間」從左翼改良主義者和民族主義領導人那裡贏得支持，而不是將共產國際建為群眾性革命力量。它解釋道，帝國主義進攻的危險只能通過全面動員國際工人階級的群眾支持才能擊敗。

官僚們對這些觀點沒有答案。他們的「答覆」是要發動對反對派的惡性恐嚇運動。

在中央委員會，現在擠滿了史達林欽點應聲蟲，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其他試圖發言時，就會遭到別人的詛咒和怒吼。在黨內其他地方也沒有什麼更好的待遇。維克多-瑟爾基描述了一場又一場會議的情景：

「在聚會上充斥那種狂熱前，我有機會發言，或者是試著發言。在三個小時的大聲訓斥後，我們得到了五分鐘時間發言。之後他們會安排、六個，有時是十個積極分子以表達對書記處的支持。人們消極地看著，帶著一定的焦慮；他們往往在我們這邊，但他們很恐慌。」（《從列寧到史達林》，第49頁）

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際，在這無情的政治迫害面前，反對派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大規模群眾集會中英勇敢地喊出了他們的口號：「讓我們火燒右派——反對富農、新富階層和官僚」，「讓我們繼承列寧的意志」，「反對機會主義、反對分裂，支持列寧黨的團結！」

官僚反應驚慌失措而憤怒。他們看到，在列寧格勒示威前一個月，由於失誤員警護送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前往一個月臺，當時數千名工人聚集起來聆聽他們的發言。現在，反對派示威被暴力粉碎了，甚至有人向托洛茨基的車開槍。

1927年12月，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沒有一個反對派被允許作為代表出席。托洛茨基的關鍵支持者被開除。然而，反對派繼續為其思想而鬥爭。倫敦的《泰晤士時報》的標題是「托洛茨基與史達林」報導：

他說：「儘管格別烏[秘密員警]的禁止和努力，反對派意見仍然繼續廣為傳播非法傳單，據真理報，每一份都被印上成千上萬...」（1927年12月2日）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官僚統治是從此轉入地下。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與 2500 名支持者一起喪失了勇氣而向史達林投降。更多被開除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也跟隨他們。托洛茨基自己被驅逐，流放到西伯利亞，然後——因為他仍然是反對派的焦點——1929 年初，他被從蘇聯驅逐出境。

儘管這些可怕的打擊，托洛茨基和他的數千名支持者仍然堅持布爾什維克主義思想和十月革命的綱領。在他們的宣傳，他們確定自己為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以區別自命為共產主義運動的主流的新貴官僚。

在流放中，托洛茨基繼續他的理論工作——他揭露了史達林主義官僚的機會主義、偽裝與背叛，並在迅速變化的情況下澄清馬克思主義的替代選擇——這也許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大貢獻。這些思想將成為新的革命一代的指導方針。

## 17. 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

從 1920 年代末起，蘇聯的官僚集團政策經歷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曲折，在國際勞工運動中創造了巨大的混亂。

該政權的支持者稱讚每一個矛盾的變化是「正確的」和「必要的」措施以捍衛蘇聯的「社會主義」。一些反對者對該政權表現的所謂「列寧主義」的滑稽醜惡感到絕望，聲稱革命的成果遭到了破壞，而俄羅斯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再被視為一個工人國家。

托洛茨基，在 1930 年代初努力應對這些問題，而得出結論認為，蘇維埃工人國家在現實中已經退化成為一種新政權：

「由於官僚集團變得更加獨立，而越來越多的權力集中到一個人手中，官僚中心主義也越來越轉向波拿巴主義 [根據法國軍事獨裁者拿破崙-波拿巴命名]。《托洛茨基 1934 年至 1935 年著作》(英文版) 第 180 頁)

波拿巴主義，托洛茨基如此解釋道，

「從歷史角度來說，波拿巴主義曾經是，並且仍然是資產階級社會發生危機時期的資產階級政府。…波拿巴主義常常意味著政治上在各階級間反復無常；但是波拿巴主義在歷史上的一切轉世投胎都保留著同一個社會基礎，那就是資產階級所有制。……

「蘇聯官僚集團的自立統治是建立在在國內和國際各階級力量之間看風駛舵這個基礎上，這一點是絕對正確的。既然官僚集團的看風駛舵以史達林個人的全民公決統治而達到頂點，那末說這是蘇維埃波拿巴主義也未嘗不可。」（《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

這個波拿巴政權的「無產階級」性質是因為事實上它不是基於「資產階級產權」的基礎上，而是十月革命創造的國有經濟和計畫經濟，反映了工人階級的歷史性利益。

該政權的歷史從 1920 年代起一直是「國內和國際各階級力量之間看風駛舵」的最佳圖解。

到 1927 年，正如反對派警告的，富農已經拿著槍頂住當局的腦門。為了提高糧食價格，他們從市場上收回自己的糧食，囤積黃金和武器準備最後攤牌。

城市受到饑餓的威脅。資本主義復辟的威脅突然成真了。

官僚機構在一片恐慌中做出反應，試圖以行政法令杜絕危險，失敗後不得不依靠暴力。他們實行糧食強制徵用。富農抵制，官僚開始全面進攻。

左派反對派久已解釋土地集體化的需要，但強調這應該是自願的，以保持農民的支持，並盡量減少幹擾。史達林對農民的戰爭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它是一個盲目的反射動作，而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

遲至 1929 年史達林仍認為「個體農戶能在給國家提供食物方面，繼續發揮主導作用……」（伊薩克-多伊徹 (I Deutscher), 《史達林評傳》(Stalin 英文) 第 320 頁) 現在，突然間農民的土地根據法令被集體化。到 1930 年，55% 的農民土地已經變成了國營農場，到 1934 年這一比例達到了 88% 。

俄羅斯農村毀於內戰。因為農民在把牲畜交公前，寧可宰殺他們，大饑荒爆發。據估計，由於官僚暴

行，導致一千萬人直接喪生。整個農民社區乃至整個民族被殺害或驅逐出境。在城市中，麵包重新開始配給供應。

這些事件粉碎了新經濟政策，結束了史達林和布哈林與黨內右派的聯盟，並成為他在 1927 年和 1934 年之間墮入暴力極左主義的真正基礎。

反對派長久以來一直主張工業化，但由於受到右派的壓力而遭到當局輕蔑地拒絕。現在，史達林發現除了工業化別無選擇——於是在恐慌下自上而下地採取了無情的強制措施。1928 年，根據反對派的提議，官僚們半心半意地退出了經濟發展的五年計劃。但現在，突然命令要在四年內完成該計畫！

大量的項目被推出——水壩、電站、鋼鐵廠、礦山 - 這在十年間改變了蘇聯。當資本主義世界在 1930 年代陷入蕭條之中時，蘇聯的工業生產躍居領先了 250 個百分點。令人驚訝的是，到 1935 年落後的俄羅斯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生產更多的拖拉機。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協調一致的發展將是不可能的。俄羅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就像今天的第三世界會繼續掙紮在絕望的貧困中。

「社會主義」，托洛茨基說：「已經證明其勝利的權利，不是在《資本論》的書本上，而是鋼鐵、水泥和電力的語言...」（《被背叛的革命》，第 8 頁）

蘇聯在 1930 年代的進步給世界各地的勞動人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在官僚統治下，也付出了可怕的代價。官僚的辦公室發出各種命令，經常是瘋狂不現實的。未能執行這些命令被視為破壞。大規模使用強迫勞動。高達 1500 萬蘇聯公民被趕進奴隸勞動營，其中包括反對集體化的農民誰，以及後來形形色色的反對派。難以計數者被犧牲。

1928 年到 1932 年，工人階級的數量從 1100 萬激增到 2300 萬，1931 年引入所謂「勞工本」的通行證將工人鎖定在他們的工作崗位上。當官僚集團培養出工人貴族的同時，工人工資的價值從 1928 年至 1935 年下降了三分之二。

牛奶人均消費量從 1927 至 1928 年的 189 公斤下降至 1932 年的每年 105 公斤，肉類消費從 27.5 公斤下降至 13.5 公斤——而同時官僚集團則牢牢確立了他們的特權生活方式。

儘管工人付出超人的犧牲，蘇聯幾乎在每一個方面仍然落後於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文化落後不是官僚支配所能克服的。先進的新產業需要高技準的勞動力，而這不能像建鐵路線一樣實現的。

為在這一基礎上實現工業化，需要將數百萬工人壓迫到極限，粉碎一切反對力量，必須要最無情的權力集中。官僚制度淪為不折不扣員警專政。

史達林同時粉碎後左派和右派，而作為官僚「共產黨」黨的最高仲裁者。史達林曾經是官僚集團執行的劊子手，而現在成了它的主人——處於最高位的官僚，給他的門客們分配特權和地位。

托洛茨基總結：

「史達林捍衛十月革命的成果不僅反對封建資產階級反革命，而且針對的勞動者的訴求、他們的不耐煩和不滿，他粉碎代表歷史性和進步的沒有特權的勞動群眾的左翼，他通過工資、特權、地位等極端分化的手段創造了一個新貴族階層。」

依靠新的社會秩序中最上層階層來反對最下層，——有時反之亦然——史達林已經將其手中的權力完全集中起來。如果不是蘇聯的波拿巴主義，這一制度還應該叫什麼呢？（《托洛茨基 1934 年至 1935 年作品集》（英文）第 181 頁）

## 18. 從「第三時期」……

外交政策是國內政策的延伸，服務於相同的利益。官僚與富農和黨內右翼暴力的決裂伴隨著在國際舞臺上猛烈地轉向極左主義。

與機會主義路線導致英國和中國災難相反，史達林於 1928 年 8 月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提出完全相反的路線以挽救當局的「革命」信譽（這是四年來第一次）。

史達林宣佈，從 1918 年以來資本主義已經過兩個「時期」，第一階段是直到 1923 年的革命時期；然後，是一個「逐步和部分穩定」的階段。現在，「第三階段」的嚴重危機開始，這將預示著資本主義的「最後的崩潰」，為奪取政權的任務已經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馬克思主義解釋說，資本主義沒有「最後危機」這樣的事情。資產階級總是通過犧牲工人階級來解決自己的問題，直到他們的統治被推翻。

然而史達林的目標不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而是促使共產國際向左發展。各國共產黨為了獲得運動的領導權，必須要粉碎所有其他政治傾向，辯論的時刻已經結束了！

作為在勞工運動處方內戰，史達林提出了瘋狂的論點，即「社會民主黨在客觀上是法西斯主義的溫和派……他們不是死對頭，而是雙生子。」（以撒-多伊徹，《史達林評傳》（英文），第 401 頁）

「史達林主義第三階段」最災難性的結果發生在德國，在那裡工人階級分裂，使希特勒得以奪取政權，第二次世界大戰變得不可避免。

由於史達林未曾預料的原因，1929 年 10 月紐約證券交易所崩潰導致了世界性資本主義衰退。尤其是德國一片荒蕪。但是由於領導層和宗派主義的危機癱瘓了勞工運動，這使得希特勒的納粹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

破產的中產階層、失業者、工人和青年都在眼巴巴地指望著白白德國社民黨與德國共產黨能拿出解決方案。而社民黨領導人卻與資本主義結合，而德國共產黨則攻擊社民黨，並破壞它的會議。

中產階層和最受蹂躪的階層越來越多地加入到了「民族社會主義」的陣營中。法西斯煽動性攻擊資本家和猶太人，他們神秘的承諾恢復德國的「偉大」。最重要的是，他們明確的決心對這些苦難中的階層而言，看起來是唯一的選擇。

在有組織的工人中，對希特勒的支持是幾乎不存在的。

托洛茨基解釋迫切需要工人組織組成統一戰線粉碎法西斯威脅，並且這樣做，工人階級就要準備奪取政權。但是，共產國際史達林的領導面對的現實卻是又瞎又聾。

德國勞工運動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無論是社會民主黨還是共產黨都有軍事力量。但是，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德國共產黨領導人拒絕與所謂的「社會法西斯主義」合作——而在 1931 年甚至走得更遠曾和納粹聯合試圖推翻普魯士的社會民主黨政府！

德國工人運動是世界各地工人的希望，其領導層沒有任何認真抵抗的嘗試就被消滅了。

史達林主義者無力得出正確的結論。1933 年 4 月，希特勒獲得權力，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宣佈德國共產黨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

領導層的歷史性失敗和共產國際內部缺乏任何批評，最終說服了托洛茨基，共產國際就和此前的第二國際一樣，作為工人革命的工具已經死亡。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勢力已被這十年的野蠻衝擊一掃而光。對於新的世界大戰和新的革命一起的預期出現了。客觀地說，需要一個新的國際為未來關鍵的鬥爭重新組織、建立並準備馬克思主義的力量。

## 19. ……「人民陣線」

歐洲的階級力量改變使蘇聯政權迅速發生一次新的大轉彎。

相比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是一個更為直接的威脅。最重要的是，史達林害怕戰爭和其會對蘇聯群眾造成的影響。為了避免戰爭，他考量有必要安撫希特勒。

在整個 1933 年，當希特勒清算了德國共產黨、社民黨和工會，並開始對猶太人大屠殺，史達林沒有做出一聲批評。在整個 1930 年代，蘇聯官僚希望與希特勒達成的協議。

但是，希特勒在他的「盟軍」帝國主義對手面前，是用「共產主義威脅」作為藉口重新武裝。他不能在這個階段被視為與史達林友好往來。（僅在 1939 年 8 月，當希特勒準備發動襲擊西方時，希特勒才與史達林簽署了臭名昭著的互不侵略條約。）

處於法西斯主義和右翼政權的包圍中，史達林的「革命」極左主義消失。托洛茨基和國際左派反對派

解釋（正如十二年前共產國際的解釋）表示，蘇聯的唯一真正安全保障是革命的國際主義——支持工人在資本主義國家奪取政權的鬥爭，向敵人發動戰爭而癱瘓反動力量。

但俄羅斯官僚卻根本不可能去遵循這一路線；因為如果俄羅斯工人被這些想法影響的化，那麼官僚集團的專制體制將成為第一個受害者！相反，他們悄悄地忘記了資本主義還處在其「第三階段」，於是他們向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尋求支持反對希特勒！

而帝國主義也沒有不願意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史達林。1934年9月，他們接受蘇聯加入國際聯盟的申請（列寧將之描述為「強盜的巢穴」）；1935年5月法國帝國主義與史達林簽訂了「互助」協定！

這是蘇聯官僚退化的一個標誌性的新階段。他們第一次公開而蓄意地與資產階級結成政治聯盟。從這點起，作為與資產階級結成「友誼」的條件，他們機會主義的失敗變成了在國際範圍內蓄意背叛工人革命。

早在1928年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時，不祥之兆早已體現，當時「一國社會主義」的思想毫無雜音就被接受。當時托洛茨基就曾警告。這將是「共產國際沿著社會愛國主義路線解體的開端」。（《列寧之後的第三次國際》（英文），第55頁）1934年後這個預言很快成為事實。

蘇聯官僚與「進步」資本主義列強糾纏之際不可避免地，國際上的諸共產黨尋求在自己的國家與「進步」資產階級和改革派達成聯盟。

現在的口號變成了「人民陣線」。工人的階級的要求從共產黨的綱領中被取消——因為這將「疏遠」的「進步」的資產階級！

史達林主義者明智地宣佈，要贏得中產階級的「廣泛支持」，只能通過局限於資產階級民主訴求的綱領。今天雖然中產階層在工業化國家已不再是群眾性力量，但是「共產黨」仍然使用相同的綱領和相同的論點。這證實，那麼和現在一樣，其真正的目的不是要贏得群眾的支持，而是爭得一個與資本主義政黨討價還價的地位。

這一立場在1935年和1936年期間在法國和西班牙爆發的革命事件中完全破產。首先在法國，然後在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在共產黨的支持下贏得權力。在這兩個國家中，經濟大蕭條和右翼的嚴酷統治為群眾鬥爭開啟了閘門。

在西班牙，1936年7月發生的軍事政變試圖推翻「人民陣線」政府。改良主義者、史達林主義者和資產階級共和黨人顛顛慄慄，而工人和農民拿起了武器。幾天之內，整個國家大部分處在他們的控制下。西班牙陷入了比俄羅斯1917年還嚴重的全面革命危機之中。

倫敦《泰晤士報》8月1日的標題是「巴塞隆納處在紅色統治下——極端分子失去了控制」。兩天以後，它的記者總結了群眾的要求：

「36小時工作周、失業津貼、控制生產、沒收和分配土地，……維持[工人]民兵武裝……」

又經過幾天：

「工人委員會已經接管大鐵路公司。何時接管有軌電車、銀行和其他重要機構，看來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泰晤士報》，1936年8月8日）

史達林並不比資產階級更少恐懼正在發生的革命。他希望與英法帝國主義者穩定的關係處於危險之中。更糟的是，西班牙工人的榜樣會威脅與感染俄國工人同樣鬥爭以控制社會。所以，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勒死西班牙革命。

西班牙共產黨亦步亦趨地追隨莫斯科的指示，發動了反對工人革命運動的全面鬥爭。

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名義下，他們主張「兩階段論」的孟什維克理論，將他們的綱領局限為「資產階級民主」，徒勞地希望以此安撫資本家，「共產主義」不會對他們構成任何威脅。格別烏的行刑隊被派往西班牙以協助解除工人武裝和消滅他們先鋒隊的可怕任務。

由於史達林獨斷專行並與帝國主義列強的媾和導致的推遲，所謂的「共產黨人」無視俄國革命的第一課：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不能保證工人階級的民主和穩定。在西班牙這樣的半發達國家中，「資產階級民主」任務只能在工人階級本身的控制下才能執行。

可悲的是，西班牙托洛茨基的同情者錯過了用他們的綱領贏得社會主義青年，建立馬克思主義群眾基礎和領導的運動勝利的黃金機會。

沒有馬克思主義領導層，工人階級無法面對階級敵人和自己的改良主義者和「共產黨」領導層的聯合攻擊。史達林主義成功地分化了運動，孤立了左派，並謀殺的最好的戰士。這使得法西斯主義的勝利無法避免。

歐洲工人階級勝利的最後希望已被撲滅，至少由此得出結論帝國主義戰爭已經是不可避免的。

## 20. 血流成河

蘇聯內部官僚集團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尖銳矛盾導致對殘餘的布爾什維克幹部的清算。

國際上諸共產黨將蘇聯粉飾社會主義的快樂祖國。史達林的繼任者赫魯雪夫在 1956 年召開的 20 屆黨代表大會上卻揭露了面紗背後真實一角：

「史達林不是通過說服，耐心解釋，並與人合作來處理事情，他強行實施自己的概念，並要求絕對服從他的意見……他放棄了思想鬥爭的方法而用行政暴力、大規模鎮壓和恐怖取代。」（《莫斯科審判》(The Moscow Trials)，第 17-18 頁）

官僚暴政有自己的一套邏輯。當鎮壓加劇，統治者對報復的恐懼相應增加。對手，由權力驅使，是不能夠信任的。即使他們放棄信仰，以後會不會再次成為威脅呢？甚至為由下而上發生的叛亂提供火種？

整個黨受到史達林和官僚集團的強烈懷疑 - 尤其是那些「老布爾什維克」，他們還記得當年列寧的黨，並只因為恐懼而對官僚主義的罪行一直保持沉默。

布哈林早在 1928 年已經開始害怕他曾幫助創建的怪物。在一個與加米涅夫的秘密討論中，他畏懼地表示：「我們可以做甚麼？面對著卑鄙的成吉思汗般程度的對手……？」（瑟爾基《從列寧到史達林》(英文)，第 91 頁）

雖然老布爾什維克們低下頭，年輕一代卻冒尖起來，渴望恢復十月的理想。日益增長的工人階級與政權之間的矛盾激化。全黨充滿沸騰不滿，而在 1930 年代初開除黨籍的人數達至幾十萬。

然而，儘管老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投降了，他們仍然比史達林和當政的官僚集團更受尊重——因為官僚集團中許多是聲名狼藉的前孟什維克和當年十月革命的敵人，只在到戰爭結束才站到了勝利的一方。

這些矛盾到 1936 年西班牙革命時期發展到高峰，在國際上工人運動所爆發的衝擊波，鼓舞了俄羅斯的人民群众重新推動工人民主行動。

官僚機構立刻要將危險扼殺於萌芽狀態。最可怕的諷刺是，在國際上承諾保證資產階級民主的同時，他們在蘇聯本身掀起了一股最黑暗的惡夢統治。

此刻發生了「莫斯科審判」：被挫敗的老布爾什維克被指控謀殺、破壞、恐怖主義等——任何你可以想像到而難以置信的誣衊以詆毀他們並恐嚇其他人。

但針對他們的主要指控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他們一個接一個被指控「與托洛茨基共謀」，自 1921 年以來他就被污蔑成「資本主義的間諜」和「德國特工」！

就這樣該政權背棄了實施「清洗」的真正動機：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工人民主、工人報復的極度恐慌，他們對國際工人運動中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列昂-托洛茨基——充滿仇恨。

正如當年在俄羅斯的《泰晤士報》記者坦言：

「問題的根源是史達林從來沒有完全贏得他自己政策的與托洛茨基國際主義政策之間的鬥爭。他永遠也不能贏得最後的勝利……共產主義仍然是國際性的……最近狂熱的共產黨人 [革命家] 的不滿在增加……更多的人關心巨大的工資不平等……它決定要永久使反對的聲音消聲，並徹底消滅國內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殘餘。」（1936 年 8 月 21 日）

在史達林的「法官」前走過一排曾經是布爾什維克領袖的行屍走肉，他們被恐嚇和勒索迫使承認任何和每件要求他們承認的事情。

三場「審判」演出分別是：1936 年 8 月（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米爾諾夫等）；1937 年 1 月（拉狄克，皮達可夫和其他人）和 1938 年 2 月（布哈林，李可夫，雷科夫斯基等）。起訴人是前孟什維克律師

維辛斯基，他在內戰期間曾與白軍合作。現在，他終於對革命的前領導人釋放官僚們的報復仇恨：

「瘋狂的法西斯警犬」！「卑鄙的人類渣滓！陰間敗類」！「打死這幫蛇鼠」

除了格別烏獲得的「供詞」，他們就沒有任何指控證據。但是，除了一、兩個例外，全部都被判處槍斃。這全部的謀殺，每一個由維辛斯基所帶來的詛咒，世界上各國的「共產黨」卻都在為它辯護。

托洛茨基解釋了整個荒唐的邏輯：

「為了使鎮壓合理化，需要製造出指控。為了讓這些不實指控變得有力，就必要以更殘酷的鎮壓來強迫。因此這場鬥爭的邏輯令史達林走上司法不倫不類的歸路。」（《莫斯科審判》，第 129 頁）

莫斯科審判，只不過是什麼托洛茨基所說的「官僚反布爾什維克黨的單方面內戰」，冰山一角。隨後一浪接一浪的逮捕潮。無數拒絕在公眾場合「認罪」的老布爾什維克，則在監獄中被暗殺。在西伯利亞勞改營中的左派反對派成員被成批地揪出來槍斃。數以萬計——俄羅斯工人運動之花被消滅殆盡。

左翼反對派至死仍然是革命者。1936 年年底在西伯利亞沃爾庫塔勞動集中營裡，托洛茨基主義者們以不屈的勇氣帶領其他囚犯向暴政作出最後的反抗，他們靠的就是仍然有的唯一武器——絕食。（《戰鬥派國際評論》(Militant International Review)，33 號，第 43 頁）

四個月後，他們的所有要求被接納。但處決亦很快開始執行。當一名男性政治囚犯被槍斃，他的妻子和任何十二歲以上的子女通常也會被殺死。

出席 1935 年第 17 屆共產黨代表大會的 1,966 名代表中，至 1938 年已有 1108 人以「反革命罪」被逮捕。當時 139 名中央委員中 98 人被槍斃。

在 1939 年的 1558852 名共產黨員中，只有 1.3% 是十月革命以來的老黨員。列寧 1917 年的中央委員會中，只有史達林作為領導者活了下來，而他身邊被前孟什維克和走狗們包圍。布爾什維克黨的最後殘餘已經被根除。

其中一名在 30 年代倖存下來的 1917 年的領導拉斯柯爾尼科夫，他當時是蘇聯駐保加利亞大使。1938 年被徵召回莫斯科「晉升」（即被槍斃），他隨即選擇逃亡，亦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史達林：

「依靠骯髒偽造的幫助下，你進行著比中世紀的女巫審判更可笑虛假的審判和指控... 花言巧語的作家美化你為與太陽和月亮並排的半神人，就像東方專制君主，享受香油拜祭。你無情地消滅令你不高興的作家們……早晚，蘇聯人民將會把你作為社會主義和革命的叛徒而進行審判。」（直到 1987 年 6 月該信才在蘇聯《火花》(Ogonyok) 上雜誌首次發表）

在 1930 年代，史達林政權下的死亡總人數估計在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萬人。如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倖存者，我們可以理解到他們對史達林的滿腔怒火。但也絕不能忘記這場屠殺不單單是貪戀權力、殘忍或（赫魯雪夫錯誤地解釋為）「個人崇拜」的後果。這是場由反革命的官僚們對抗革命性的俄國工人階級的政治反撲的高峰。

史達林所建立的政權跟列寧和托洛茨基建立的政權毫無共同之處，雖然表面上（所為的「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蘇維埃」等名稱）會讓人有誤解。血河將馬克思主義與俄羅斯官僚制度徹底分開。

以史達林主義的歷史性體現於是這首幸災樂禍的詩，刊載於在莫斯科第一次審判後的一份白色雜誌：

「我們感謝你，史達林！

十六個惡棍，

十六祖國的屠夫

已將他們送去見自己的祖先……

「但是，為什麼只有十六個？

給我們四十，

給我們幾百，

數以千計；

在莫斯科河上架座橋，

一個沒有樑或塔的橋，

由蘇聯腐肉建成的橋 ——  
並將您的軀體加上！

## 21. 結論

在蘇聯的史達林主義和西歐法西斯主義的恐怖蔓延下，馬克思主義力量在 1930 年代覆滅了。只有托洛茨基（在 1940 年被史達林特工暗殺）的天才和堅定，與一群很少的追隨者仍然進行對下一代爭取社會主義的工人鬥爭作思想再教育。

托洛茨基到他生命的最後依然繼續捍衛十月革命的成果——就是國有計劃經濟——儘管「蘇維埃」的政權官僚畸形化，他拒絕接受俄羅斯已成為「國家資本主義」。

但與此同時，他解釋說這政權沒有「改革」重建工人民主的可能。它必須由工人階級的群眾運動推翻及瓦解，並再次將政權重奪回到工人的手中，重新走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托洛茨基最突出的作品是《被背叛的革命》，裡面提供了這本小冊子所提出論述的詳細和科學的解釋。

今天蘇聯的力量平衡已經變得完全不同。今天蘇聯工人階級是世界上最強大和擁有最好教育的。官僚在今天已經沒有用處，它已成為經濟和社會進步的一個絕對障礙。戈巴契夫試圖精簡官僚機構（正如在他之前的勃列日涅夫和赫魯雪夫一樣）不能改變其統治官僚的歷史破產。

相反，它反映了蘇聯的史達林主義危機的新階段，爆發政治革命的客觀條件愈趨成熟，以推翻官僚主義並恢復工人階級的角色。（泰德-格蘭特（Ted Grant）的《戈巴契夫：改革還是革命》（Gorbachev: Reform or Revolution）充分說明這點[編者注：泰德-格蘭特（Ted Grant）對蘇聯前景的立場，以及多數派的意見均在在這個網站史達林主義崩潰崩毀的章節中刊登]）

匈牙利的工人階級在 1956 年和波蘭在 1980-81 年的等已經出現那些輝煌的政治革命「彩排」。

在國際上，80 年代的狀況正好是 30 年代後期的相反：革命運動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裡覺醒。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再一次吸引著從利物浦到斯里蘭卡，從南非到西班牙的工人和青年們的目光。

我們必須重新學習俄國革命的勝利和退化的教訓，以迎接在今後一個時期將會面臨的任務：各大洲工人階級奪取權力，建立工人民主，進行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改造。

### 問題討論

共產黨在中國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結盟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的錯誤是甚麼？

左翼反對派應該在 1928 年被共產黨開除後呼籲獨立成立一個新政黨嗎？

史達林的確犯下錯誤，但他不是提出了五年計劃以糾正錯誤嗎？

對抗上臺後的希特勒法西斯的反動勢力，團結所有民主力量的人民陣線不是必然策略嗎？

大清洗證明瞭革命的成果已經完全消失了嗎？

俄羅斯今天新的革命任務什麼？



## 重要的參考圖書書目

這不是閱讀書目，而是作者寫作所使用的書目（已標注頁數）。相關書名也可找到較新的版本，有時使用不同出版商的同一書籍標有\*，雖然其中一些書已經絕版，但應該可以在一家比較好的公共圖書館借閱到。

### 第一部分

- 《1917年至1923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23)  
， E. H. 卡爾(E. H. Carr) 1966 \*Pelican Books  
《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The Bolsheviks Power)  
A. F. 伊林-贊諾夫斯基 (A. F. Ilyin- Zhenevsky) New Park  
《震驚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kd), 約翰.里德 (J. Reed) 1977年 Penguin \*  
《從列寧到史達林》(From Lenin to Stalin) , V. 瑟爾基 (V. Serge) 1937年 Pioneer\*  
《俄國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 托洛茨基 (L. Trotsky) 1967年 Sphere\*  
《我的生活》(My Life) L. 托洛茨基(L. Trotsky) 1975年 Penguin\*

### 第二部分

- 《1923-1924的空白期》(The Interregnum 1923-1924) E. H. Carr (E. H. Carr), Pelican\*  
《共產國際 1919 至 1943 年文檔》(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 Documents)  
德格雷 (J Degras) 1956 年倫敦  
《共產國際的興起與衰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E. 格蘭特(E. Grant),  
1985 年 戰鬥派  
《國家與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列寧。1976 年 北京  
《官僚主義還是工人政權》(Bureaucratism or Workers' Power) R. 斯維曼 (R. Silverman) 和 E 格蘭  
特(E. Grant) 1982 年 戰鬥派  
《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Terrorism and Communism) L. 托洛茨基(L. Trotsky) 1975 年 New Park  
《新路向》(The New Course) L. 托洛茨基。1956 年 New Park\*  
《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 L. 托洛茨基。1967 年 New Park\*  
《列寧後的第三國際》(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L. 托洛茨基 1974 年 New Park  
《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真正的主張是什麼？》(Lenin and Trotsky: What they really stood for) A. 伍  
茲(A Woods) 與 E 格蘭特(E. Grant) 1972 年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lumbo\*  
《1923 年反對派文檔》(Documents of the 1923 Oppostion) 1975 年 New Park

### 第三部分

- 《一國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E. H. 卡爾(E. H. Carr) 1970 Pelican Books\*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德意志意識形態 (The German Ideology) 1969 年 Moscow  
《不斷革命論》和《總結與前瞻》，托洛茨基。1962 年 New Park\*

### 第四部分

- 《史達林評傳》(Stalin) I. 多伊徹 (I. Deutscher) 1966 年 Penguin  
《聯合反對派綱要》(The Platform of the Joint Opposition 1927), 托洛茨基。 1973 年 New Park  
《莫斯科審判：選集》(The Moscow Trials : An Anthology) 1967 年 New Park

## 延伸閱讀

英國《戰鬥派》(Militant) 報紙的相關文章:

683 期 (Militant 683) 列寧最後的鬥爭 (Lenin's Last Struggle)

834 期 1917 年回顧 (overview of 1917);

835 期 1917 年 2 月 (February 1917); 842 期 1917 年 4 月 (April 1917);

859 期科爾尼洛夫反叛 (Kornilov's revolt);

869 期十月革命 (The October Revolution); 1987 年 11 月史達林主義的崛起 (rise of Stalinism)

《戰鬥派——國際展望 18 期》(Militant International Review 18), 被遺忘的革命——1919 匈牙利俄國革命研究導論 (Russian Revolution study guide), 尤其是關於俄國 1917 年二月革命和俄國革命的文章。

《十月革命的理想》(Ideals of October) 英國工黨社會主義青年組織 (Labour Party Young Socialists—LPYS) 發行的

《保衛十月》(In Defense of October), L. 托洛茨基

《官僚主義還是工人政權》(Bureaucratism or Workers Power?), 瑟維曼與 (泰德) 格蘭特 (Silverman and Grant)

《列寧和托洛茨基: 他們真正代表什麼?》(Lenin and Trotsky: What They Really Stood For), (艾倫) 伍茲 (Woods) 與 (泰德) 格蘭特 (Grant)

《十月的教訓》(Lessons of October), L. 托洛茨基

《俄國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 托洛茨基

《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約翰. 裡德 (John Reed) ——對 1917 年大事件的生動見證

《掌權的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 in Power), 伊林-申維斯基 (Ilyin Shenevsky)

《從列寧到史達林》(From Lenin to Stalin), 瑟爾基 (Serge)

《共產國際的興起和衰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列寧的最後書信》(Last letters and articles by Lenin)

《來自左翼反對派的挑戰》(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L. 托洛茨基

(包含托洛茨基的《對官僚主義的挑戰》(challenge to bureaucratism)、《新路向》(The New Course)、

《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Towards Socialism or Capitalism)

《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L. 托洛茨基

《社會民主與戰爭干預》(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Wars of Intervention) L. 托洛茨基

《喀琅施塔得》(Kronstadt), 托洛茨基與列寧

《被背叛的革命》(Revolution betrayed) L. 托洛茨基 關於一國社會主義的附錄

《列寧之後的第三國際》(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布爾什維克主義還是史達林主義》(Stalinism or Bolshevism)

《1931 至 1937 年西班牙革命》(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1-1937)

《史達林偽造歷史》(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





[www.socialism.hk](http://www.socialism.hk)  
[socialist.hk@gmail.com](mailto:socialist.hk@gmail.com)

香港九龍深水埗  
價格: HK\$ 30.00